



金融与发展

2020年12月号

马丁·桑德布的疫情后世界
第4页

丽莎·D.库克介绍
第48页

大象的秘密工作
第58页



美丽新世界

未来的工作和机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目 录



现在是时候考虑当前的政策选择将如何影响经济的长期发展了。

未来的工作和机遇

- | | | | |
|----|---|----|---|
| 4 | 疫情后的美丽新世界
政策制定者在经济扰动期间的决策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马丁·桑德布 | 19 | 分配至关重要
经济学无法对分配问题避而不谈——而经济学必须为其他学科的见解留有余地
本雅明·阿珀鲍姆 |
| 10 | 不再重回过去
加大对“以人为本”政策的投入，将帮助在疫情后的世界塑造更好的经济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 22 | 就业市场反思
新冠疫情下，人们正加速转向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
萨比娜·德万、埃克哈德·恩斯特 |
| 12 | 实时差异
新冠疫情突显了高频数据在卫生危机快速响应中的价值
陈文婕 | 26 | 未来的就业
在自动化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有些工作岗位将消失，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工作岗位。
萨迪亚·扎希迪 |
| 16 | 不利起点带来的长期阴影
在疫情期间毕业的年轻人将受到深远的影响，且这种影响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消除。
哈尼斯·施万特、蒂尔·冯·瓦赫特 | 32 | 如何创建更平等的美国社会
一位领先的进步论经济学家在当前关键时刻提出了美国经济的改革措施
希瑟·布希 |



本期还有

- 36 多希望你能来旅游
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最大
亚当·贝苏迪
- 28 支持年轻一代
年轻人深受疫情冲击,但他们也可以推动全社会
予以积极应对
哈马德·阿尔玛迈德、阿什利·史特勒·琼斯、
戴维·沃尔科特、蒂芙尼·于
- 40 打造数字经济新高地
世界需要数字交易的全新治理体系
穆拉特·桑梅兹
- 44 重建工人权力
与雇主相比,工人的权力受到了系统性的削弱,
这抑制了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
劳伦斯·米舍尔
- 58 大象的秘密工作
非洲森林象正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对抗着气候变化
拉尔夫·恰米、康内尔·弗伦坎普、
托马斯·库西马诺、法比奥·贝扎吉



其他内容

- 48 经济学人物
偶然而成的经济学家
姜成贤介绍了密西根州立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丽
莎·D.库克——她向我们展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
歧视是如何伤害我们所有人的
- 52 前沿
坚决打击腐败
欧盟首位反欺诈检察官反思应对跨国犯罪的挑战
- 54 返归基础
何谓非正规经济?
减少正规经济之外的劳动者,将有助于经济实现可
持续发展
科琳·德莱沙、莱昂德罗·梅迪纳
- 56 图表释义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疫情让年轻人苦不堪言
梅琳达·威尔
- 63 书评
被忽视的女性:专为男人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
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繁荣与萧条:全球金融泡沫史
威廉·奎恩、约翰·D.特纳
打造现代化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979-2003
哈罗德·詹姆斯





新变革机遇

有人说过：“有时几十年风平浪静，有时几个星期改变历史。”其恰如其分地诠释了2020年的情况。新冠疫情给世界带来了颠覆性破坏与深远影响，迫使各国政府推出可能需要数年才能消化并实施的重大政策变化。这场疫情催生了各种技术以及学习、办公等新的生活方式，也使人类社会在一夜之间跨入新时代。

对许多专业人士而言，在家工作反而更加轻松。但是，对大部分人而言，尤其是对酒店、旅游、快递、零售和基础护理等行业的工作人员而言，疫情已给他们造成了严重且持久的经济创伤，包括失业、技能差距扩大、不平等加剧和心理健康损害等。疫情尤其对女性、年轻人和低技能弱势群体产生了重大影响，可能会使他们陷入长期迷茫。那些不幸在经济衰退时期毕业并开始工作的年轻人，在随后的10—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收入可能会很低。

本期《金融与发展》将与《世界经济论坛》合作，关注未来的工作与经济机会，探讨为建设以人为本的更美好未来可采取的措施。

马丁·桑德布 (Martin Sandbu) 指出，改革必须致力于在更多地方为更多人创造更优质的工作岗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Kristalina Georgieva) 强调对女性和年轻人进行投资并加强教育与培训，这对增加就业岗位具有重大意义。希瑟·布希 (Heather Boushey) 和劳伦斯·米舍尔 (Lawrence Mishel) 主张采取政策增强工人的权力。其他作者则呼吁改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特别是零工和非正式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加强保健和育儿支持；进一步完善累进性的税制，以解决收入不平等问题；增加对数字接入和绿色技术的投资等。

最严重的危机通常蕴藏着巨大的机遇。眼下，我们必须抓住机遇进行彻底变革，着眼现在，展望未来。FD

吉塔·巴特 (GITA BHATT)，主编



本期封面

2020年12月号指出，我们无法重现昨日之经济，也不应该这么做。插画家戴维·博纳齐 (Davide Bonazzi) 为本期封面绘制了一个更绿色、公平和智能的世界——而这需要人们制定正确的政策策略。

主编：Gita Bhatt

执行编辑：Maureen Burke

高级编辑：Andreas Adriano

Adam Behsudi

Peter Walker

数字编辑：Rahim Kanani

在线编辑：Lijun Li

生产经理：Melinda Weir

文字编辑：Lucy Morales

编辑顾问：

Bernardin Akitoby

Celine Allard

Bas Bakker

Steven Barnett

Nicoletta Batini

Helge Berger

Paul Cashin

Martin Čihák

Luis Cubeddu

Alfredo Cuevas

Era Dabla-Norris

Mame Astou Diouf

Rupa Duttagupta

Deniz Igan

Christian Mumssen

İnci Ötör

Catriona Purfield

Mahvash Qureshi

Uma Ramakrishnan

©20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版权所有。

如需翻印本刊文章，可通过填写在线表格 (www.imf.org/external/terms.htm)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copyright@imf.org 进行申请。如用于商业用途，可通过版权税计算中心 (Copyright Clearance Center, www.copyright.com) 获得授权，并支付一定的象征性费用。

本刊的文章和其他资料仅为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反映IMF的政策。

订阅服务、地址变更和其他广告事宜，请联系：

IMF Publication Services

Finance & Development

PO Box 92780

Washington, DC, 20090, USA

Telephone: (202) 623-7430

Fax: (202) 623-7201

E-mail: publications@imf.org

《金融与发展》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的季刊 (地址: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用英文、阿拉伯文、中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出版。

中文版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翻译出版。

地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新知大厦

电话: 010-88190916

传真: 010-88190916

邮政编码: 100142

网址: <http://cfeph.cfemg.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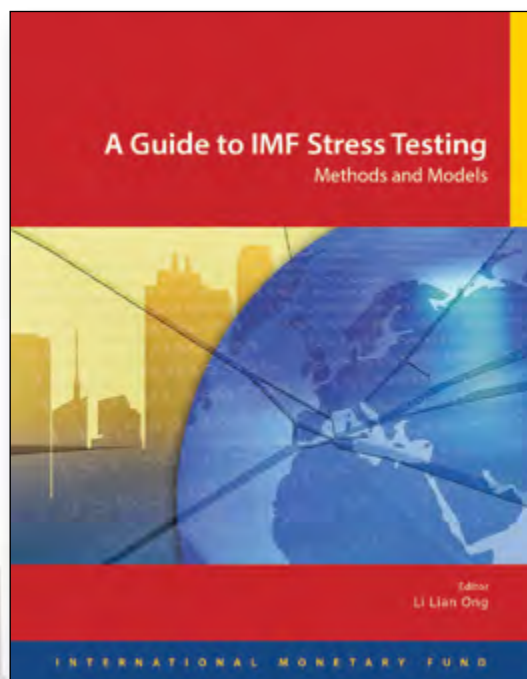
英文版刊号: ISSN 0145-1707

中文版刊号: ISSN 0256-2561



FSC FPO

金融压力测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力测试指南：方法与模型》

翁利连

(Li Lian Ong)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系统的压力测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本书汇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单独与其他组织合作开发的压力测试方法和模型（即所谓的“硬件”）。可登陆以下网站在线获取压力测试工具包和程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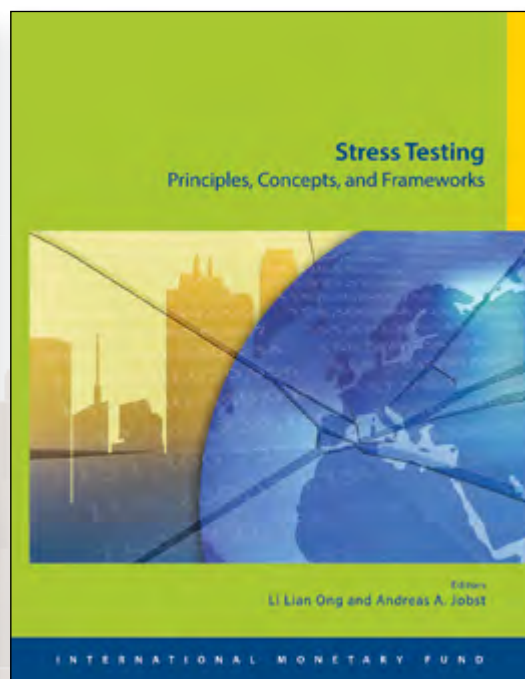
www.elibrary.imf.org/page/stress-test-toolkit

imfbk.st/20952 

价格65美元。英语。

©2014年，版权所有。630页，平装本
ISBN 978-1-48436-858-9

货号：SOASTEA



《压力测试：原则、概念和框架》

翁利连和安德烈亚斯·A.乔布斯特
(Li Lian Ong and Andreas A. Jobst)

压力测试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金融监督、监管和风险管理工具。本书将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对压力测试“软件”的分析和应用——它们是以可靠、一致的方式应用压力测试“硬件”的一套最佳实践、原则和框架。虽然适当的方法或模型对压力测试的可用性和可信性至关重要，但必须在连贯且包容的框架下开展这种实践。

imfbk.st/24471 

价格65美元。英语。

©2020年，版权所有。544页，平装本
ISBN 978-1-48431-071-7。

货号：GSTPCFEA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疫情后的 美丽 新世界

政策制定者在经济扰动期间的决策
可能会影响未来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马丁·桑德布

全球经济已在社会、环境、甚至思想等方面显现出严重的不可持续性，而这场疫情更是令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过去 40 年，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现象都在加剧，这使两极化现象日益严重。虽然发展中经济体有数十亿人民摆脱了贫困，但在脱贫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不平等现象也日益加剧，社会局势更加紧张。

全球经济的不平衡增长使人类逐渐接近灾难性气候变化的悬崖边缘。

世界各地接二连三的政治动荡也说明人类社会不可能再维持先前的做法。经济政策思维正颠覆着公共支出、中央银行和政府干预经济等方面的传统观念，并迫使人们进行变革。

新冠疫情将造成和平时期最剧烈的社会衰退和经济崩溃。政策在数天或数周内就发生

了巨变，这些改变是大多数满怀抱负的政治家穷其一生却不可奢望的。面对这次重大疫情，多国政治领导人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干预经济活动，并以国家力量承担起劳动者和企业的大量风险。

虽然疫情前景仍不确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摆脱了疫情暴发初期的冲击，是时候放眼未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策略，去塑造全球经济的长期道路。今年，全球经济和政策格局突变——从现实出发预测经济风险和回报，并考虑政府可能出台的新政策，则显示一切都已永远变得不同。但是，世界将如何改变还不得而知，而且未来几年各国领导人做出的政治决策将产生重大影响，决定疫情后的经济是否能让更多人共享繁荣。

社会矛盾加剧

首先，新冠疫情暴发导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是加剧了社会撕裂，也刺激了对现有政策的讨论。

此外，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不平等的担忧，因为封锁使无法居家办公的人们生活更加艰难。相对体力工作者而言，白领阶层（尤其是知识密集型劳动者）的处境持续改善，这不仅包括工资的相对提高，也包括工作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相对改善。然而，长期以来酒店、旅游、快递、零售和基础护理等行业的大部分体力劳动者的处境不断恶化，而疫情使之进一步加剧。体力工作者需要近距离接触他人，因而要么最容易受到封锁影响（非必要工种），要么最容易受到传染（必要工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女性和年轻人受到的打击最大，因为他们在这类行业中的占比极高。

第二，疫情的一个相关经济影响是：其增加了针对零工和其他非正规劳动者的政策挑战。毋庸置疑，在富裕国家中，现有的福利国家越来越无法适应非传统形式的就业和合同。而在落后国家，非正规经济部门仍然是建立并完善社会安全网的一大障碍（请参阅本期《金融与发展》的《回归本源》一文）。封锁表明，即使是十分健全的政府机构，在使政策惠及非正规劳动者方面也存在着缺陷。在制定收入支持计划时，政治和立法工作往往以疾风迅雷般的速度推进，但是支持计划有时无法达到既定目标，因为政府常常无法确定谁才是最需要支持的劳动者。

长期以来，庞大的非正规劳动力市场一直是贫困经济体的一大突出特征。但是，服务行业“不稳定的无产阶层”（他们的就业和收入缺乏保障，且无法享受良好的公共服务）数量的不断增加，这是造成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中许多人财务极其脆弱的一个主要原因。依赖低收入和不稳定工作的劳动者在疫情中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因为他们从一

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冲击。

此外，即使政府采取了空前的收入支持措施，一般也不足以抵消对早已困顿不堪的人们造成的严重损害。因此，新冠疫情不仅加剧了由来已久的两极分化，也提高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

第三，疫情带来的经济影响也以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式加剧了不平等矛盾：伴随远程办公突然兴起，企业不得不快速转变对数字技术的利用方式，这势必会影响生产模式和经济剩余的分配方式。虽然很难预料到这些转变带来的影响，但其似乎可以提高那些拥有“现代化程度最高”工作、较强认知技能且适合远程办公的劳动者的生产率。因此，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好工作”和“坏工作”之间的差异。

疫情还引发了经济地域上的政治分歧。最明显的是，疫情催生出关于全球化的新问题——密切联系的各国如何应对人员往来可能造成的传染；全球供应链制造中心停工导致生产中断，如2020年1月武汉的情况；还有对进口医疗设备的突然抢购。

疫情对各国国内的地域影响则不太明显。区域不平等一直是两极分化最糟糕的表现形式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不断趋同，但这一趋势在1980年左右便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这是因为工业部门就业（遍布全国）逐步让位于知识服务业就业（仅集中于大城市）。当前，新冠病毒在所有发达城市和衰退城市中的蔓延情况类似，而经济扰动暂时改变了白领们的工作方式和工作地点——政策制定者有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永久性地改变经济繁荣的地理分布。

应采取何种措施？

出于以上原因，疫情迫使政策制定者直面那些被长期忽视的问题。但是，如果疫情之前的做法不再适用，则问题将仍然是：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以改变这种情况？应设定怎样的目标？这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新冠疫情危机再次凸显了这些问题，此前政策制定者曾多次试图解决，但最终均以失败告终。

但有两个问题已经变得更加清楚。第一，工作的性质和质量是重中之重，且所有的改革计划必须致力于创造更多更优质的工作岗位。第二，改革必须是大范围、大规模的，其应拥有罗斯福新政或马歇尔计划般的雄心壮志。

必须采取以就业为中心的措施，因为在这个领域，许多长期经济问题与疫情相关的经济问题相互交织，这包括：不平等、问题、临工问题、新的非正规经济部门、地理差异和技术变革等。优质工作岗位能否大幅增加，也是衡量一系列综合政策成功与否的主要标准。

应采取何种政策当然是一个重大问题，而这些政策应该以民主为基础。我在近期出版的《归属经济学》一书中提出，相关措施应做到以下几点：

- 其应通过对雇主提出更高的要求，实现生产率增长或技术升级。只有用高效的工作岗位替换低效工作岗位时，工作才会变得更安全、更快乐并能带来更丰厚的薪水。北欧经济体推行工资均等化，其让低效率工作变得不经济并刺激有益提升生产率的资本投资，从而促进了生产率的增长。其他各国也可以效仿这种方法，不论是在监管宽松还是监管严苛的劳动力市场，都可以之应对长期存在的低薪、低效工作问题（例如英国和法国都存在“不稳定的无产阶层者”）；此外，鉴于新冠疫情中一些经济活动无法开展，上述方法也可用于为再分配提供指导。具体而言，需要大幅提高最低工资，并实施严格的工作场所标准。

- 其应形成有强劲需求增长的“高压经济”，提升生产企业扩大生产的信心，并确保在低效工作岗位消失的同时提供更多高效工作岗位。高需求对改善处于劳动力市场边缘的群体的处境（包括年轻人、未受过良好教育者和少数族裔）必不可少——他们往往在经济衰退时最先被解雇，在

经济好转时最后才被雇佣。为解决问题，需要实施“偏热”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以使需求始终稍领先于经济产能，鼓励企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并努力提高生产率。显而易见，大型富裕经济体（尤其是储备货币发行国）更容易实施这种政策，因此，引领全球需求增长的责任自然也落到了这些国家政策制定者的肩上。

但是，如果疫情之前的做法不再适用，问题将仍是：应采取怎样的政策？应设定怎样的目标？

- 其应降低人们辞去坏工作并找到好工作的相应成本。为实现这一目标，政策制定者需要制定一整套政策，包括增加培训技能投入，推出拥有充足资源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并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将福利与具体职位区分开来。换工作和提高工作技能对工人而言代价高昂，而且如果缺乏必需的生活保障，就没人愿意换工作或提高工作技能。因此，克服这些障碍的唯一途径是无条件地直接提供资金支持，包括提供基本收入或实施负的所得税，以避免陷入福利制度下的低收入陷阱。这也是改善极端贫困者生活条件最有效和最快速的方法，特别是在无法采取更具针对性的方法来惠及最需要帮助的人们时尤其如此。

- 其应改革税制，以鼓励优质工作。这需要降低劳动税，以便鼓励工人更换工作，鼓励企业进行招聘。由此产生的税收损失必须通过其他渠道弥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税应发挥更大作用，最理想的方式是征收净财富税——与其他资本税相比，净财富税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此外，应大幅提高碳税税率，以将劳动力和资本重新配置

全球经济面临巨大挑战，仅靠增量政策不可能取得明显成效——且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击溃。

到绿色产业。应以“碳费和红利”和“碳支票”等方式，对碳税收入进行再分配。最后，在确定跨国公司的税率时，应确保跨国公司和本地公司之间的公平竞争环境，并允许政府在征收资本税方面具有更大的操作余地。

• 其应改革金融体系和税收规则，降低对债务融资的偏好，使之对股权融资更为有利——后者更有利于提高生产率，且能在劳动力和投资者之间保持适当的风险平衡。对于无力偿还政府疫情救助贷款的公司，政府应允许将其债权置换为可交易的股权。

• 其应鼓励相关企业在更广泛地域内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工作。政策目标应是让更多地区成为提供更多高薪工作岗位的东道主。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难，至少要加大交通和网络覆盖、地方基础设施和便利设施等方面的投资，提高相关地区的吸引力，并制定政策为衰退地区的新设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远程办公的兴起提供了一个机遇，各国政府可籍此实施税收或监管激励措施，将优质工作从大城市转移到相对偏远的地区。

重新诠释世界

所有这些工作看起来都非常艰巨。魔鬼在于细节：要实施大规模改革，就需要在微观层面作出无数利弊权衡并解决后勤方面的难题。但全球经济面临挑战如此巨大，仅靠增量政策不可能取得明显成效——而且很容易被既得利益者击溃。因此，任何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深入改革。鉴于政策已发生巨变，这似乎也不再是一种不现实的措施。

旧有的宏观经济规则已被抛弃。不久前还在强调财政责任的政治家们，如今却纷纷批准了空前的财政赤字，他们主动打开预算闸门，以维持人们的收入并为企业提供流动性。

此外，公共支出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尤其是实施较严苛福利制度的国家纷纷开始改革。在短短几个月内，英国从零开始设计出了一套欧式工资补贴制度。美国政府允许民众失业，但大幅增加了个人失业救济金。与此同时，所有发达国家都为企业制定了非常慷慨的贷款计划，在某些情况下，所有信贷风险已从银行转嫁给政府。在许多国家中，不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看，政府都在大举介入金融业：政府正在承担以往由私人部门承担的风险。

上述的一部分政策转变是前所未有的，另一些则是对既有改革的加速推进。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乏力，这使央行政策制定的多项根本性前提发生了变化。虽然并不情愿，但各国央行大多接受了有关证据，承认了利率将长期走低这一现实。尤其是，美联储对“让经济偏热”有了更大的容忍度，不再担心一旦失业率下降通胀便会加剧的问题。这两种思维方式的转变促使各国央行早早开展了全面行动，以满足疫情期间的需求，提供低成本融资，并确保金融市场的正常运行——这一鸽派的央行思维转变很可能将持续下去。

此外，企业使用的技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远程办公方式或将继续存在。调查显示，即使在疫情结束后，许多公司仍计划保留居家办公的做法。无论如何，今年企业突击掌握的技术和组织上的经验知识，一经习得就不会失去。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将永久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

不仅是用人单位如此，消费方式也是如此。

即使疫苗彻底消灭了新冠病毒，也不可能彻底逆转在线零售的增长，而在线联络取代实体出行的趋势也会延续下去。一场剧烈的经济变革正在发生。

与较贫穷国家相比，较富裕国家更容易应对这些变化。但是，较低收入经济体也有机会实施变革。至少是，富裕国家的政策变革将成为全球的一次学习经验，其应影响对最贫穷经济体财政援助和债务减免的政策条件。一些新的情况也为新兴经济体提供了直接机会：远程办公方式的普及，使这些国家有望吸引更多高附加值外包服务。

变革的问题

通常，政策制定者最多只希望小幅调整本国的治理体系。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想维持现有体系的运行。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领导人的决策可以帮助其国家改变社会发展的长期道路。眼下就是一个这样的机会。

目前，在展望各国经济的未来时，领导人们都面临着三大问题：

• 第一个问题是：**开展资源的重新配置，还是恢复原有的做法**？国民经济已被打乱，企业和劳动者都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疫情过后，先前行得通的工作能否继续有效？某些业务是否值得投资或关停？是否实施有关政策会产生重大影响，其将决定资本和劳动力是否转移到新经济活动领域，经济是否按危机前模式开展资源配置。即使新冠疫情导致某些经济活动的利润发生了不可逆转的下滑，但由于其中涉及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不出台新的政策，资源的重新配置就不会自动发生，或者无法达到必要的程度。即使现有的经济模式已被打破，新经济模式也不会自行建立起来。

• 第二个更发人深省的问题是：“**重建更好的经济模式，还是恢复原有的经济模式**？”利用经济扰动来构建全新的经济与希望尽快重回正轨之间有着本质区别。两种不同的取向对应着不同的政策考量——大致就是：是将资源重新配置在疫情所

需的最低水平，还是利用经济中断从根本上重新设计全新的经济模式。重建更好的经济模式需要企业和人们做的更多，例如，需要加倍关注气候变化目标或提高工资和工作标准，利用经济扰动时期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而“恢复原有经济模式”旨在使经济主体通过以最少、最快和最轻松的方式作出调整。

• 最后的问题是，**各国是否准备好再次拥抱经济规划**——也即利用干预手段有意识地逐步重塑经济。让资源在各行业之间重新配置、推进区域融合或“重建更好的经济模式”的政策目标，首先意味着需要对国家协调并引导私人部门行为的能力拥有一定信心，并且要有实现预期目标的意愿。20世纪80年代，各国开展经济规划的信心和意愿都有所下降，这使经济规划不再流行。结果是，当今大多数政府既不习惯也不擅长进行战略规划。

虽然如此，有迹象表明制定经济规划的做法正在回归。气候变化、地缘政治动荡和快速的技术革新以及当前肆虐的疫情给政界人士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们引导经济走向更好的方向，而不是简单地释放私人部门的“动物精神”。在新冠疫情之前，经济学和经济政策建议已倾向于更积极的干预措施，以促进经济的良好运转。

大多数领导人都宣告要“重建更好的经济模式”，并监督资源重新配置给更安全、更环保、更高效的经济活动。这至少隐含地需要政府承诺让国家在经济中发挥更积极和更具战略意义的角色——而这需要超出大多数国家近期所做到的程度。未来，各国是否更有能力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和更具战略性的方式治理国家，它们的领导人是否有魄力做到这点，我们将拭目以待。^[FD]

马丁·桑德布（MARTIN SANDBU）是《金融时报》的欧洲经济评论员，著有《归属经济学》一书。



不再重回过去

加大对“以人为本”政策的投入，将帮助在疫情后的世界塑造更好的经济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

疫情在许多国家二次暴发，人们自然都希望疫情能迅速回到疫情前的世界。要是我们能尽快驱散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摆脱无尽的沮丧和绝望，那就好了。新冠病毒已经夺去了一百多万人的生命，与此同时，贫困加剧、失业率攀升和教育中断已经彻底改变了数十亿人的生活。我们恐怕将再次面对“迷失的一代”，这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

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回到过去的旧有经济模式，重回那种增长缓慢、生产率低下、不平等严重、气候危机恶化的昨日之经济中。我们必须着眼未来，实施变革。目前，我们面临着两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其一是共同对抗这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其二是着手建设一个更加环保、更加包容和更有活力的世界。

我们可以从疫情期间坚守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那里汲取灵感，包括医护工作者、快递员和清洁工等。虽然他们辛勤工作且为他人承担风险，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难以维持生计。

为了帮助这些劳动者，也是为了帮助全体民

众，各国政府已向家庭和企业提供了约 12 万亿美元的财政支持。超常规的货币政策措施维持了信贷流动，帮助数百万企业维持生存和保留工作岗位。这是我们前行的基础，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挑战。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能惠及每个人的更好的经济。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确定关键的优先事项：对女性和年轻人进行投资，对教育与技能培训计划进行投资——它们能创造更多的机会并提高生产率。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以人为本”的政策。

赋予女性经济权能

这场疫情对女性的打击尤其严重：首先，女性的工作更多集中在遭受重创或高风险的行业，且以往的经验表明，疫情结束后，发展中国家的女子重返学校的可能性很小。女性也更有可能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中谋生，因此可能无法获得政府支持。调查显示，在这场疫情中，多个发达国家的女性每周花在不计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高于 15 小时，远超男性。

换句话说，各国近几十年来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成果正岌岌可危。我们需要以周密的政策和强大的数据为基础，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例如，应在保育支持方面增加预算，这将使更多女性有机会外出工作。应推动普惠金融发展，这将帮助女性更好地应对疫情造成的冲击，并利用机会进行创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各成员国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来促进性别平等，包括实施性别预算。此外，可参考加拿大的做法，即考虑同工同酬的法律责任，与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并让财政部在核心问题上发挥牵头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研究表明，加速推动性别平等可以给全球带来巨大变化。在很多不平等的国家中，缩小性别差距可使其 GDP 平均增长 35%。

加强对年轻人的投资

女性所面临的技能培养和正式就业等问题，对年轻人的影响更为广泛。年轻劳动者和未受高等教育者开展远程办公的可能性明显较低，因此

他们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疫情造成史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中断，直接影响了10多亿学生，甚至可能严重影响他们的终生收入和生活水平。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近深入研究了新冠疫情危机破坏对人们获取机会的方式，并提出了政策建议，以缓解这种情况。例如，许多国家可以完善劳动力市场法规——它们可以构建更强大的社会安全网来保护劳动者，而不是试图保护可能会消失的特定工作岗位。

各国可以推行提高教育水平的政策，例如巴西制定的向孩子上学的家庭提供直接现金补助的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 Program)。

各国还可以参考约旦的做法，制定创业支持政策并降低创业成本，帮助年轻人创业，同时制定全面周详的计划，以提供职业培训并帮助年轻人找工作。在许多国家，还可以为私人部门提供工资补贴，以鼓励雇主雇用失业青年并为他们提供培训。

提供机会

制定以人为本的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那些能够提高非正式经济部门和低技能岗位劳动者能力的政策尤其如此。这些劳动者的工资本来就很低，工作也缺乏保障，而且几乎没有积蓄以备不时之需。疫情来袭时，他们大多无法远程工作，面临缺乏安全保障、住房拥挤、难以获得良好医疗等问题。

与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如果各国都能增加投资来充分挖掘这些劳动者的潜能，整个社会都将从中受益。再培训和提高技能在这方面大有可为，在拯救我们的自然环境方面尤其如此——例如，重新造林和水土保持以及让建筑物更节能环保的政策就是这样。

此外，还可以考虑推动互联网和金融服务的普及。全球范围内，约有17亿成年人仍然没有银行账户，约有34亿人仍无法上网。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信号塔和光纤网络等实体基础设施，同时也需要制定完善的隐私法和消费者保护法。

要实现普惠金融，政府还需要采取行动提高人们的金融知识水平，消除财产所有权的法律障碍，以及提供身份证明来方便人们开设银行账户并获得数字金融服务。

如何提供资金

在明确需求后，我们要考虑钱从哪来。即使不扩大现有的预算规模，若能提高支出效率，也能实现更好的结果。

尽管面临重重挑战，利比里亚、马拉维、尼泊尔和所罗门群岛近十年来都实现了税收收入的大幅增长，增幅达到GDP的7%到20%不等。填补税收漏洞并提高税收系统效率为许多国家提供了前进的机会。

我们必须着眼未来，实施变革。

对于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而言，赠款和优惠贷款在未来仍是提高劳动者技能和生产率的关键所在。对于债务水平适中的国家而言，贷款不失为一种不错的选择——如果它们可以利用相对宽松的融资环境，则更是如此。埃及最近完成了两笔总计58亿美元的债券发行，其中7.5亿美元为绿色债券（这是中东地区的首笔绿色主权债券），主要用于污染防治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致力于与各成员国合作，帮助他们制定以人为本的政策，并帮助它们负担这些政策。我们的经济咨询和能力建设工作，帮助成员国增加/改善了社会支出，调动了国内收入，并提高了税收效率和累进性。

疫情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81个国家(包括48个低收入国家)提供了1000多亿美元的融资。我们也正在考虑各种选择来调整我们的贷款工具，以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为各成员国服务。

随着全球经济从疫情危机的深渊中恢复，开启漫长的攀行之路，有一件事非常明确：我们不会再重回过去。如果要克服危机并实现经济复苏，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带领所有人向新目标迈进。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我们才能创建一个更加繁荣、更有韧性的世界。

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 现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



实时差异

新冠疫情突显了高频数据在卫生危机
快速响应中的价值

陈文婕

高频数据不仅对追踪疫情造成的经济破坏和扰动至关重要，还有助于实时确认疫情对不同特定人群（尤其是女性）造成的不同影响。

我们密切关注着人们种种行为每周（有时是每天）的变化情况——包括餐厅预订、行人交通、手机数据、机场安检数量、零售活动，甚至是夜间从太空拍摄的地球图像。这些高频数据中包含的蛛丝马迹可能描绘出疫情对女性、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前景的影响，并可能预示了未来几年的变化。受益于数字化的快速发展和大数据的兴起，基于实时数据进行决策的趋势在疫情前就已出现。新冠疫情进一步凸显了实时数据的巨大用处。

新冠疫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各国官方的季度甚至月度数据，都难以跟上失业潮的发展速度——其程度在大萧条之后前所未见。疫情中编制的劳动力市场数据所描绘的劳动力市场图景可能令人迷惑，因为官方数据的编制者一直在努力将休假计划和兼职工作也考虑在内，因而他们在发布数据时都会提示可能存在高度不确定性。

我们的最新研究使用了全球职位搜索引擎主要提供商之一的 Indeed 公司提供的实时数据。这使我们对发布在线招聘广告的几乎所有雇主的行为都有了独到的了解。Indeed 在线职位发布数据的主要优点是该信息接近于实时数据，并且可以完全覆盖在线职位发布地全部情况（而政府调查数据仅限于接受调查的雇主）。此类实时招聘信息，为以下事实提供了分析依据（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变得愈发明显）：女性用工需求的下降幅度远大于男性用工需求，而且低技术工人的情况可能

会更加糟糕。

实时查看劳动力需求

伴随停工停产，在样本国家中，从4月开始新发布的职位（指发布时间在7天以内）数量比2019年同期平均下降了约50%（见图1）。此后，职位数量呈逐渐恢复趋势，但尽管样本国家中许多部门已经复工，在线发布职位的趋势仍显著低于往年。职位发布少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低，也意味着人们很难找到工作。这通常是经济健康程度不佳的一个信号，在企业解雇更多工人且许多国家政府提供的工资和收入支持已经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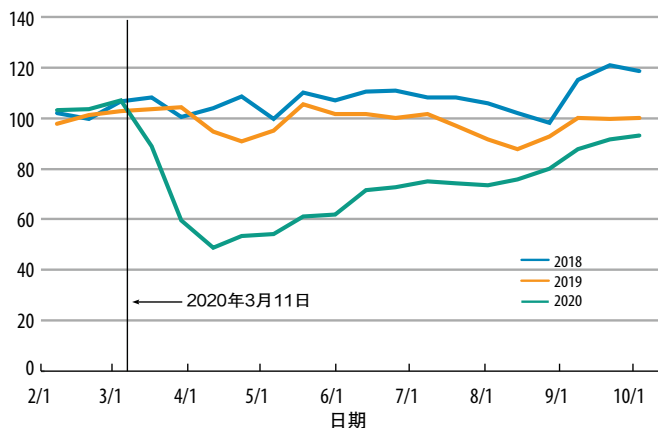
Indeed 的数据（其主要关注发达经济体在线发布的职位）显示，职位发布减少的情况是广泛存在的。适于居家办公的工作与不适于居家办公工作都受到了同样的影响。随着经济的逐步恢复，对不适于居家办公工作的需求比适于居家办公工作的需求增长更多，这可能是由于政府取消了居家令的缘故。

但是，某些群体受到的打击比其他群体更大。与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不同，当时绝大部分就业损失由男性承担，而当前的危机对女性的影响更大。例如，在6月初，在线发布的偏女性类职位数量比去年6月下降了约40%（见图2）。而偏男性职位的发布数量则比去年下降了约35%。即使在经济恢复阶段，这种差异仍然存在。这一结果也印证了相关调查的结论，即疫情对女性造成的打击更加严重，当前疫情不仅影响女性就业，而且也增加了她们的家庭负担。在工作方面，女性在酒店、育儿、餐饮、娱

图1
工作机会更少

2020年职位发布趋势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的最初几周里，一些国家的职位发布数量骤降50%，远远低于往年。

（新职位发布总数的7日移动平均线，以对应年份2月1日的数据为基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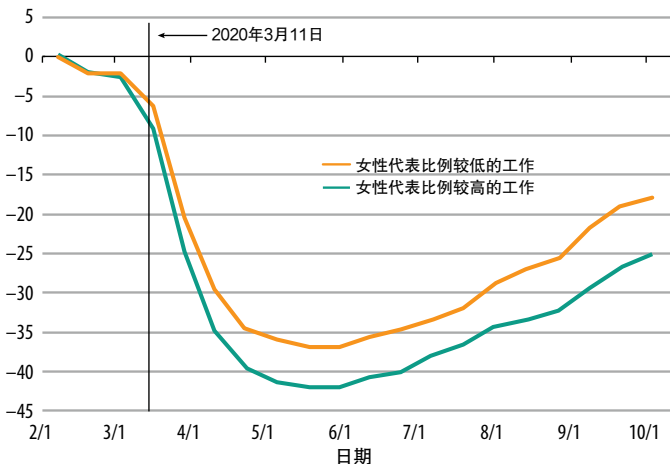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Indeed公司作者估算结果。

注：该图是一个散点图，显示了不同年份新职位发布的7天移动平均线随时间的变化。新发布的职位是指在Indeed平台系统发布时间不超过7天的职位。垂线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病”的时间。包含的国家/地区有阿联酋、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波兰、新加坡、瑞典和美国。其缩写（ARE, AUS, AUT, BEL, BRA, CAN, CHE, DEU, ESP, FRA, GBR, HKG, IRL, ITA, JPN, MEX, NLD, NZL, POL, SGP, SWE和USA）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地区代码。

图2
性别差异

在新冠疫情期间，偏女性类的职位需求发布量降幅更大。

（2020年对比2019年；趋势差距(%)，以对应年份2月1日的数据为基准）



资料来源：Indeed数据；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作者估算结果。

注：该图是一个分箱散点图，其中显示了使用国际劳工组织行业分类的女性代表职位发布的7天移动平均线随时间变化趋势之间的差距（2020年对比2019年）。垂线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肺炎为疫情的时间。包含的国家/地区有阿联酋、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波兰、新加坡、瑞典和美国。其缩写（ARE, AUS, AUT, BEL, BRA, CAN, CHE, DEU, ESP, FRA, GBR, HKG, IRL, ITA, JPN, MEX, NLD, NZL, POL, SGP, SWE和USA）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国家/地区代码。

乐等职业中所占的比例往往很高，但这些工作都要密切接触他人，所以在疫情之初，女性受到的打击最大。学校和日托服务机构的关闭，意味着孩子们必需留在家中，这也给女性一记沉重打击。此外，女性往往更可能退出劳动力市场或缩短工作时长，这无疑会影响她们的工作前景。这些趋势可能会对男女工资差异产生负面影响——这种差距在疫情来袭之前的几年一直在缩小，但疫情可能会抹杀之前的成果。

同样，对低技能工作需求的下降幅度也远大于对高技能工作需求的下降幅度。许多需要密切接触他人的行业往往会雇用低技能工人。高技能职位发布数量虽然比去年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见图3），但到目前为止，其仍然是需求最多的部分。换句话说，申请低技能工作的求职者的工作机会，比申请高技能工作的求职者的机会少了很多。由于低技能工作通常工资较低，因此这一趋势对于工作资历较少的低收入群体尤其不利。在政府支持即将耗尽的国家中，低收入群体不太可能拥有足够的积蓄以度过职业空档期，毕竟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中，要找到一份新工作的难度大大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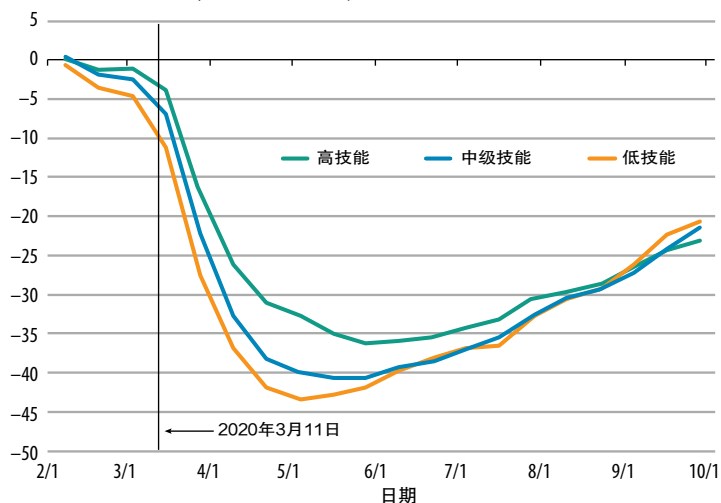
职位发布和政策支持

实时数据的证据显示，政府的更多经济支持，与最初几轮封锁措施期间在线职位发布数量的降幅之间存在相关性。各国制定并实施了强有力的财政和货币措施来抵消疫情的负面影响。经济支持包括刺激性的财政支出，如为失业者提供收入补助、企业救济（某些明确要求其保留员工关系）和家庭债务减免。需要注意的是，各国在疫情之前的经济状况有所不同，这可能影响其政策在疫情中的表现，在政府提供经济支持相对较多的国家，职位发布趋势与上一年相比的差距较小。当控制了各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老年人口占比等变量后，上述模式依然存在。在财政刺激措施（包括对企业的赠款和贷款等）更多的国家，此类

图3

技能差距

低技能工人的职位发布数量的下降速度比高技能工人职位发布降速更快。
(2020年对比2019年; 趋势差距(%), 以相应年份2月1日的数据为基准)



资料来源: Indeed数据; 国际劳工组织 (ILO) 以及作者估算结果。

注: 该图是一个离散化散点图, 其中显示了使用国际劳工组织行业分类、按技能划分的职位、发布的7天移动平均线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差距(2020年与2019年)。垂直线表示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疫情为“大流行病”的时间。包含的国家/地区有阿联酋、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瑞士、德国、西班牙、法国、英国、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波兰、新加坡、瑞典和美国。其缩写(ARE, AUS, AUT, BEL, BRA, CAN, CHE, DEU, ESP, FRA, GBR, HKG, IRL, ITA, JPN, MEX, NLD, NZL, POL, SGP, SWE和 USA)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家/地区代码。

刺激措施可能有助于减缓空缺职位发布的下降速度。但是,随着政府开始减少支持措施并重启经济,被支持企业在疲软经济中的表现如何,尚待观察。

展望未来

我们的研究结果证实了实时数据在快速演变危机中的价值。这些数据帮助确认了疫情在加剧男女差距和贫富差距方面的影响。但是如何利用实时数据来制定未来的政策? 如果说有什么办法的话,这些数据能帮我们把握未来的可能趋势,以及在当前如何确定支持措施的目标。

受冲击最大的是酒店、餐饮、旅游和个人服务等大部分甚至完全停工的行业,这并不令人惊讶。由于停工,这些行业在招聘职位总数量中的占比大幅下降。相反,卫生保健、社会服务和教育领域的工作职位在招聘职位总数量中的占比一直在上升。问题是,这一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 答案将取决于疫情的演变情况和经济复苏的途径。

尽管 Indeed 数据的覆盖范围主要集中于发达经济体,但巴西、墨西哥、波兰和阿联酋的职位发布数据的变化模式也表明,疫情期间其劳动力需求急剧下降。由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拥有大量的非正规部门,因此在线职位招聘(主要反映的是正规部门的就业情况)的减少可能无法完全反映疫情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女性受到的冲击可能比男性更加严重,而暂时停课对女性教育的影响可能会引发长期不利后果。与发达经济体一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当务之急是控制疫情,同时减轻个人和企业的收入损失。从长远来看,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的政策需要解决人力资本积累受挫和不平等现象加剧的问题,并在促进正规就业的同时解决非正规就业问题。

如果这些变化是永久性的,则实时数据将成为对劳动力进行重大重新配置的预测工具——这种重新配置可能使许多工人感到痛苦,尤其是低技能且难以再培训的工人。这种不确定性只会使弱势

群体需要更多的支持和保护。为解决受重创的群体(例如女性和低技能工人)的问题,政策应包括鼓励平衡工作和家庭照顾责任的激励措施,让人们更容易获得保健、育儿和计划生育知识,以及扩大对小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支持等措施。针对面临更严重的长期失业风险的工人,应探索相关的工人(再)培训和雇用补贴计划。

世界各国正在设法应对疫情产生的社会影响,而上述数据也只是冰山一角。数据表明,性别和阶级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数据也再次证明了加大教育和基础设施投资、补贴托儿服务以及提供带薪育儿假等政策的价值。这些政策不仅对解除女性束缚、赋予其经济权能至关重要,对促进新冠疫情后的全面经济恢复也是必需的。FD

陈文婕(Wenjie Chen)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的高级经济师。

不利起点带来的 长期阴影

在疫情期间毕业的年轻人将受到深远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可能永远无法完全消除。

哈尼斯·施万特和蒂尔·冯·瓦赫特

对于那些将在疫情后幸存下来的全球数百万年轻人来说，他们未来的处境仍会十分艰难。对于初入职场者来说，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不仅使他们的职业生涯起步艰难，而且还有可能使他们在未来数十年里收入下降，误入犯罪歧途，家庭生活陷于不幸，甚至连寿命都可能都短于那些更幸运的求职者。

以上是对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的长期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后得出的残酷结论。研究人员基于先前经济衰退的数十年的数据，得出了关于美国的一系列令人警醒的结论。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加拿大、德国、英国、奥地利、西班牙、比利时、挪威和日本也都存在相似的情况。

高中和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困境引起了媒体的关注。22岁的泰莎·菲利普奇克 (Tessa Filipczyk)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海洋与海岸科学专业的一名毕业生，她告诉彭博新闻社她已申请了与海洋保护、海洋植物研究和气候变化倡议有关的

工作。她原计划在读研究生之前先工作一年。然而，她目前一份工作都没有得到，现在仍与父母住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拜疫情所赐。”她说。

杰登 (Jayden) 是一个17岁的女孩，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她说：在疫情前她希望在密苏里州东部读完高中后成为一名机械师。她希望在汽车修理厂找份工作，但是计划被搁置了，目前她只好在一家快餐店工作。

她说：“我不想永远在快餐店工作，但是如果无法找到一份符合我事业的工作，我也不想贸然从快餐店辞职。”

近期，我们对1976年至2015年的40年间在美国繁荣和萧条时期的求职者的情况开展了研究。我们对在大萧条时期的应届生进行了观察，我们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我们对身边朋友（他们毕业于大衰退时期）的观察——即便在多年之后，那些在经济衰退期就业的群体与在衰退之前

就业的群体相比，他们在工作质量和工作满意度上都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基于研究结果，我们估计，对于2020年开始人生中第一份全职工作的约680万美国年轻人来说，他们在其工作生涯的前10年中可能会损失约4000亿美元的收入。该预测以2021年经济能够快速复苏的假设为基础。如果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在明年持续或加深，则2020年应届毕业生的情况可能会更加糟糕，而且2021年新入场者将面临同样糟糕的情景。

随着世界各地争相研发有效疫苗，应对疫情经济危机的政策制定者应首先解决上述群体面临的困境。短期内，应对措施可能包括提供求职援助、鼓励该群体从事兼职工作、对新雇用人员提供工资补贴等。从中期来看，福利和支持政策需要考虑到疫情的长期影响，特别是受教育程度较低群体受到的影响。

重要的是，要让年轻劳动者知道其将长期面临的负面影响及其原因，让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技能或者个人失败而导致的，借此激励从事低效率工作的劳动者继续寻找机会，使之随着经济复苏而找到更好的工作。

自十多年前的大衰退以来，经济学家们对在经济衰退期开始职业生涯的劳动者遭受的长期损失已经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传统上，经济学家将经济的繁荣与萧条视为一种暂时的现象。但是，全球大量的横截面数据和纵向数据表明，经济衰退给在此期间就业的劳动者造成了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MBA毕业生、经济学博士、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于各年龄段、各教育水平的大多数群体来说，都存在同样的长期影响。

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无法就业的求职者，在毕业后10至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的收入都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非白人劳动者会经历更长的失业期，他们短时间内也会更加贫困。更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不得不找份低薪工作，其中部分人可能会通过后期找到更好的工作而得以恢复。研究还发现，该群体中的人员更有可能出现

自尊心受损、犯罪率高企以及对政府不信任的状况。

我们发现，无论男女，不论白种人还是非白种人，也不论是高中辍学者、高中毕业生或大学毕业生，他们受到的影响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见图）。但是，更脆弱的新入场者往往会受到更大的影响。例如，在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当中，拥有大学学历的人会遭受大约6%的初始收入损失，而高中辍学者的收入损失则高达15%。

不过，在经济衰退期开始职业生涯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收入、工资或工作质量。研究人员记录了许多其他经济、社会甚至健康方面的影响。这些因素可能会反过来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率，从而进一步加深其初始收入受到的影响。

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的自尊心较低，饮酒过量的可能性更高，肥胖率也更高。

个人收入的降低意味着家庭收入的降低、住房拥有率的降低以及（对于低技能新就业者而言）贫困率的升高。这也反映在择偶模式上：经济衰退期的初入场者更有可能找同病相怜者作为其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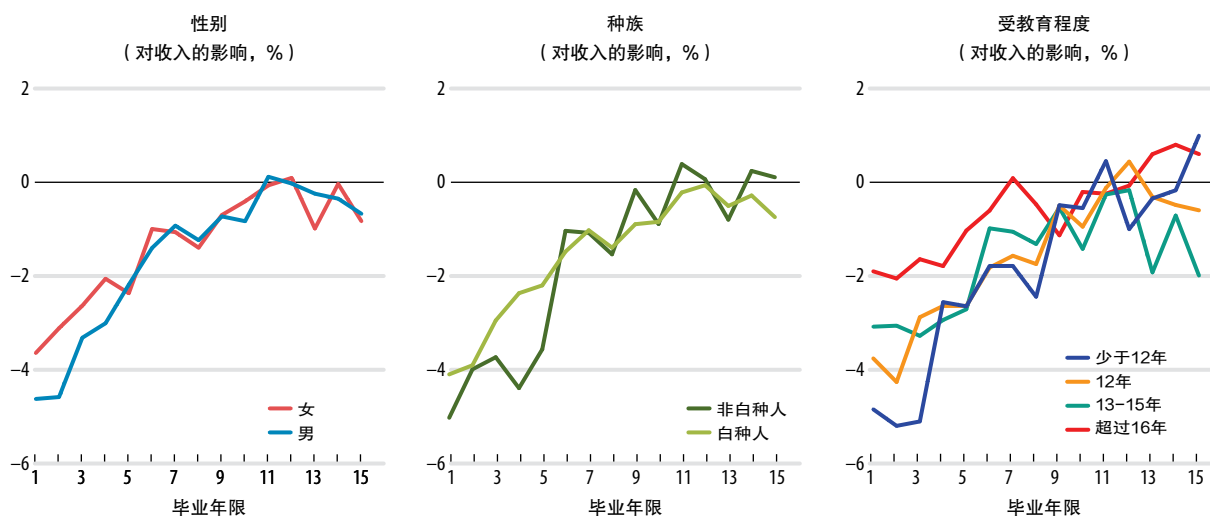
“补充营养援助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等社会保障计划，似乎可以缓冲一些不利影响。然而研究人员发现，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自尊心较低，饮酒过量的可能性更高，肥胖率也更高。如果这些社会和健康影响反馈到工人的生产率上，则可能会对经济成果造成长期的不利影响。

我们对美国政府的“人口统计系统数据”、“当前人口调查数据”、“美国社区调查数据”以及“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其数据早至70年代）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在经济衰退期就业对收入的负面影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对于中年员工来说，开始工作时的失业率每上升1%，他们的

图1

惨淡的十年半

对衰退期初入场者的收入的长期影响适用于男人、女人、白种人、非白种人以及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人员。



资料来源：哈尼斯·施万特和蒂尔·冯·瓦赫特；2019年；《不幸人群：根据大量横向数据预测对在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的长期影响》；《劳动经济学杂志》37: S161-S198。

注：图表中显示初入场者失业率每上升1%对收入产生的影响百分比。

收入会下降约 1%。2020 年中期的失业率大约为 10.5%，比危机爆发前的几个月高出 7%，这表明，当前的年轻员工到 40 岁时，他们的年收入将比去年已就业的人员减少 7%（见图 1）。

更突出的是，与幸运者相比，在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的死亡率在他们 40 岁出头时就开始上升了。初次就业时的失业率每升高 3.9%（这大致相当于 1982 年经济衰退时的情况），初入场者的预期寿命便缩短 5.9 到 8.9 个月。我们估计，2020 年初入场者面临几乎两倍失业率，其预期寿命将缩短 1 至 1.5 年。

虽然平均死亡率对于特定个体而言影响相对较小，但总的来说，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等大衰退期间，将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影响。对死亡率的长期影响主要是由疾病相关原因引起的，例如心脏病、肝病和肺癌等，这些可能与不良的生活方式和压力有关。其对药物过量使用导致的死亡也有一定影响，但对中年人自杀、致命事故或其他外部原因没有影响。

对在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健康的长期负面影响还带来了不利的社会和健康后果。虽然发现

该群体更有可能较早结婚生子，但从长远来看，他们的家庭状况并不很好。我们发现，他们到中年时的结婚率较低、离婚率较高、孩子也较少。在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还面临更高的工伤残障和社会安全残障保险费率，他们也更有可能与领取残疾津贴的配偶结婚。

总而言之：经济衰退期初入场者不仅在短期内面临着收入的重大损失，其还将面临广泛的社会和健康影响，其家庭财务、家庭构成和寿命也将受到持续影响。本文引用的证据主要来自于工业化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更容易获得研究不幸起步的长期影响所需的数据。然而，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不幸人群可能会受到更大范围或更长时间的不利影响。鉴于疫情造成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大衰退，制定相关政策和聚焦个体的战略来减轻对初入场者的持久伤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FD}

哈尼斯·施万特 (HANNES SCHWANDT) 是卫生经济学家和经济人口统计学家，就职于西北大学。蒂尔·冯·瓦赫特 (TILL VON WACHTER) 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教授。

分配至关重要

经济学无法对分配问题避而不谈——而经济学必须为其他学科的见解留有余地

本雅明·阿珀鲍姆



照片-DENNO BACVIC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丰富但社会不安的时代。工业革命后经过 250 年的发展，全球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世界人口将近 80 亿，丰富的物资资源足够使每个人都能过上前所未有的舒适生活。但事实并非如此，而这主要是因为分配造成的。

发达国家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正拖累全球经济增长并威胁着自由民主。经济学家们往往对公共政策制定具有深远影响，他们在分析分配不公问题、研究其后果以及制定补救措施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过去的半个世纪也已积累了大量数据。在过

去的十年中，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的兴趣和研究明显增多。

正如经济学家们已了解到要利用更多的知识来增进对世界的了解一样，正如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接受了需要设法改善金融市场不完善之处一样，他们正在认真研究如何应对复杂的分配问题。

经济学长期以来对繁荣背后的分配问题漠不关心，这牺牲了少数群体的利益。

然而，作为经济学学科的细心观察者（尽管是透过窗户看进来的局外人），我认为要讨论这些问题，似乎仍然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许多经济学家对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一直持怀疑态度。许多人不愿触碰他们认为带有规范性质的问题。这些疑问和疑虑相互交织，导致经济学忽略了其他学科的见解，也造成经济学自身缺乏多样性。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们对繁荣背后分配问题漠不关心，这牺牲了少数群体的利益。因此，也不难得出，如果经济学科更加多样化，那么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假设会冒犯一些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有句名言，他坚定地认为：优秀经济学家在从事学术工作时不能带有政治观点。但弗里德曼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的兴趣、方法和结论都来自于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在这一点上，他和其他所有人都一样。

百家争鸣有时会让问题越辩越清，但有时也会制造混乱，因为新的声音会挑战人们先前已经确信的观点。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也使问题更加清晰：它让我们明白，哪些事情我们并不了解。

平等与效率

不平等属于经济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财富和收入的分配，对机会的分配、商业周期的运行机制以及创新步伐都有重大影响。不平等会使公共政策遭到扭曲，增加寻租精英阶层以及寻求援助者的力量，同时会削弱对教育、基础设施和研究进行公共投资所需要的共同目标感。

几十年来，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通过再分配政策解决不平等，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经济学家亚瑟·奥肯（Arthur Okun）称之为一种“重大的权衡”。但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加剧，而乘机研究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是消除不平等的唯一希望。近期的一些研究（包括乔纳森·D. 奥斯特里（Jonathan D. Ostry）及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同事（Ostry, Loungani 和 Berg, 2019 年）进行的相关研究均发现，严重的不平等实际上会阻碍经济发展。

然而，即使是那些认为这些证据令人信服的经济学家，也会在向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议时，犹豫是否应将分配问题考虑其中。用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两任总统顾问查尔斯·舒尔茨（Charles Schultze）的话来说，经济学家一直以来都将自己视为公共政策辩论中“支持效率的一派”。原因之一就是，在提倡效率方面，经济学家认为自己代表了普通民众的利益。曾就职于奥巴马政府（同时也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的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曾表示：“如果没有经济学家，所有人就都只会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而没有人愿意为效率发声。而‘效率’事实上代表了‘每个美国公民’

的利益。”过去半个世纪的种种事实有力地说明，仅仅提倡效率并不能为普通人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经济学家扮演的角色具有真正的价值，无人可以替代。因此，对减少对这一问题关注所带来的后果有些许犹豫，也是合情合理的。

不仅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不愿介入经济产出的分配问题，他们将其视为一种政治辩论。结果往往是，经济学家们在应对分配问题上十分狡猾——他们会指出实施更有效政策来实现平等分配的益处（不论这些益处具体是什么），同时又表示最终的详细分配方案都需要由政客们敲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罗默（Paul Romer）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Romer 2020）中指出，经济学家应该“在政府官员向其寻求规范性问题的答案时说‘不’。”

我知道罗默这一建议的吸引力何在。对于要得出具有操作性结论的学科而言，自负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自负甚至也许是必要的：毕竟无论如何，都必须做出选择。但在降低潜在损害方面，自负明显颇具吸引力。

问题在于无法避免做出规范性判断。

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都赞成取消最低工资法。1987 年，我的前辈们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赞成废除最低工资法的社论，理由是“经济学家们实质上已达成共识，即：最低工资的想法已过时。”这完全是对经济效率所做的判断。经济学家并未假装其已考虑了有关最低工资的其他论点。但是，他们从效率出发提倡这种政策变化，隐含地贬低了这些论点。（而且，实际上，这种效率论点甚至也是错误的。几年后，两位经济学家采取了激进的方法——他们收集证据并得出不同的结论。美国工人仍在承受着相关的后果。）

即使是真诚地接受相关论点而回避分配建议的经济学家（尤其是真诚地接受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也必须认识到，实际上，他们正在将分配问题排除在公共辩论之外。要真正关注分配问题，就应该将分配问题作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而不是将

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丰富了经济学内容，但这么做的目的不应是创建某种混合的超级社会科学。

其视为需要补救的副产品。

当经济学家们主张实施某项政策并称其会带来广泛益处时，如果并不存在一种能广泛分配这种益处的机制，则经济学家们会面临巨大的困难。在主张贸易协定时，经济学家通常会计算净收益，却迟迟不去解决其分配问题。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 几年前曾告诉我：“经济学家的观点总是赢家可以补偿输家，但赢家从未兑现过。”例如，1998 年，赫菲 (Huffy) 公司为了满足沃尔玛对廉价自行车的需求，将生产转移到中国；但该公司此前每年在俄亥俄州的塞利纳镇制造约 200 万辆自行车。原本属于赫菲工人的停车场现已盖起一座新的沃尔玛，而塞利纳镇（以及美国各地）的每个人都可以买到便宜的自行车。这些工人们已经失去了工作，但沃尔玛却基本没有兑现补偿失业工人的承诺。总而言之，为了“人民”利益的倡议，常常以漠视人民的疾苦而告终。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借鉴

本文并不主张经济学家应该为经济产出的最佳分配提供全面的指导。他们也做不到这一点。但与其他学科相互借鉴丰富了经济学的内涵，例如，经济学已经纳入了心理学的见解，吸收了研究经济活动空间维度的人口学家的真知灼见，也受益于对经济思想演变的考察。但其最终目标并不是创建某种混合的超级社会科学。

相互借鉴的目的，是为其他观点留出余地。通过重视分配的重要性以及考虑其他学科知识的重要性，经济学家可以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更好的指导。

例如，一项令人不安的心理研究表明，经济不平等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不亚于绝对贫困。这一

见解并不容易纳入经济模型中，也不需要这么做。

关键问题是在进行经济决策时，如何将这一信息与经济分析共同考虑在内。

俗话说，科学家分为两种，即：试图了解世界的科学家和试图改变世界的科学家。经济学的性质无疑将经济学家归入第二类，但是经济学家似乎并不总能理解这意味着什么。把分配问题当做一个独立问题，这在政治上是极其幼稚的；这因而往往会限制经济思想发挥其有益作用。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 (Gustav Ranis) 注意到，许多经济学家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时存在困难，因为这些国家将本应优先考虑的事项排在了后面。经济学家强调效率是公共政策的最重要目标，同时将政治稳定和平等分配视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拉尼斯认为，应该将顺序颠倒过来。人们首先必须认同政策有利于平等、稳定，然后才可能支持提高效率的措施。

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无论你认为自己对世界有多么了解，你仍然需要说服他人来聆听你的见解。FD

本雅明·阿佩尔鲍姆 (BINYAMIN APPELBAUM) 是《经济学家的时刻：假预言家、自由市场和社会断裂》的作者，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编辑部商业与经济学方面的首席作者。

参考文献：

Boushey, Heather. 2019. *Unbound: How Inequality Constricts Our Economy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Ostry, Jonathan D., Prakash Loungani, and Andrew Berg. 2019. *Confronting Inequality: How Societies Can Choose Inclusive Grow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ayne, Keith B. 2017. *The Broken Ladder: How Inequality Affects the Way We Think, Live, and Die*.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Romer, Paul. 2020. "The Dismal Kingdom: Do Economists Have Too Much Power?"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就业市场

新冠疫情下，人们正加速转向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

萨比娜·德万和埃克哈德·恩斯特

随着数百万工作岗位的流失、机器人数量的增加和大多数白领工人居家办公，新冠疫情似乎已让全球人们的工作进入了一种新常态。但其中许多新情况的出现，实际上源于各国未能成功应对疫情前便已出现的一些大趋势。至少近 20 年来，不断变化的人口状况和技术变革一直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加剧了不平等现象，让就业越来越不稳定，经济安全愈发没有保障。

换句话说，“新常态”其实并不新。疫情只是

加快了变革步伐，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体而言），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算，发展中国家将因疫情损失 2200 多亿美元。

正如政界人士喜欢说的那样：既然危机已经降临，我们就不应该浪费危机带来的机会。各国政策制定者必须把握机会，进行前所未有的彻底变革。必须抛弃就业相关的错误想法，把握疫情带来的机会，建设一个更具韧性、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续的经济。

越南河内栋多郡范玉石
(Pham Ngoc Thach) 街排
队等用餐的外卖配送员



反思

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要实施该变革，不仅要具备疫情发生之前的条件，还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相关的假设条件，首先：

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等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也面临着这一问题。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中，青年人口正在激增。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人口数量将在未来 20 年内达到增长峰值，而安哥拉和赞比亚等较小国家则正处于人口结构转型的早期阶段。

传统观点认为，不断增长的青年人口能够提高劳动者与儿童和退休人员之比，进而创造人口红利。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这一假设。只有相关经济体能够提供生产性就业岗位并带来更高工资时，青年人口激增才具有优势。印度 15—29 岁的青年人口为 3.62 亿，比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即便在疫情暴发之前，印度该群体的失业率已高达 17.8%，是整体劳动人口失业率的三倍。这些不具备生产性岗位所需技能的年轻人很可能会最终失业，或只能在既不纳税也不受政府监管的非正规经济中从事低端工作（请参阅本期《金融与发展》的“回归本源”部分）。

如果无法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将面临工资下降和工作环境恶化的压力，最终不仅将导致其生活质量恶化，还将阻碍经济发展。如果年轻人找不到达到中产阶级工资的工作，我们就不能指望发展中经济体的中产阶级会继续壮大。

与以往的危机一样，这场疫情中，年轻人是最先受到社会、教育和经济冲击影响的群体。今年 4 月和 5 月，对 112 个国家 1.2 万名年轻人进行的网络调查证实了这一情况，当时疫情正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请参阅本期《金融与发展》的“图表释义”部分）。

国际劳工组织 (ILO) 调查发现，18 岁至 29 岁的年轻人中，有 17% 在疫情暴发后失业，42% 因疫情导致收入减少。若无法提供高效且优质的工作岗位，将经济发展希望寄托在人口优势上的发展中经济体，终将以失望告终。

速度与激情

技术进步已在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变革，而疫情使技术进步进一步提速。对许多人来说，技术提高了效率，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但对有些人而言，技术打乱了他们的生活。显然，自动化已经取代了部分工作，如扫地机器人可以代替清洁



工清扫医院病房，高速路收费站不再需要收费员，聊天机器人取代了客服代表等。与此同时，数字平台也创造了全新的职业，如软件编程、医疗保健，还有披萨外卖配送员和网约车服务等。

关键在于：谁的工作将消失？谁又能够胜任新工作？

疫情暴发之前，自动化技术就已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不足为奇，尤其是在一些地区，新技术曾促成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首先从农场到工厂，再到服务业——这引发了结构性转型。

在采用新技术成本较低且能带来更多产出和效率的岗位上，企业会选择用机器人代替工人——正如早年纺织工人发现机器取代了自身工作一样。自动化在发达国家（和中国）发展速度更快，因为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成本较高，企业有充裕的资金推动自动化进程。但发展中国家也在积极推动自动化。尽管发展中国家可能劳动力过剩且成本较低，但这只是影响总生产成本的一个因素。

疫情凸显了人力劳动力和分散于全球的供应链的脆弱性，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推进自动化。有些国家还可能想通过将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作岗位带回美国和欧洲推动生产“回流”——这一趋势在疫情之前就已出现。因此，发展中经济体必须为三重冲击做好准备：国内企业自动化导致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替代；将生产回撤本土的外资企业增长放缓；以及外需低迷导致出口放缓。

此外，疫情加速了平台经济的发展。从电子商务到零工经济，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选择足不出户，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

零工经济的低准入门槛为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风险。危险在于，这些平台吸引的年轻人和低技能工人的数量激增，可能会超过其服务（如数据处理人员、客服代表和网约车司机等）的需求。

这些劳动者不仅会发现自己经常“没有工作”（即未充分就业），而且还面临工作环境恶化的压

力。平台零工越来越多国家的实际情况证明，平台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低。而且，之前的一个假设是大多数零工先前从事的都是低端非正式工作，但这一假设并不总是成立。非政府组织 Perkumpulan Prakarsa 和全球就业与发展智库 JustJobs Network 于 2015 年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对象为通过网约车应用程序 Gojek 和 GrabBike 提供摩托车出租车服务的 205 名司机。调查结果显示，在提供网约车服务之前，他们有 51% 曾在正规经济中就业。

此外，疫情还加速了远程学习和远程办公趋势的出现。但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加大了买得起电脑、有网络连接群体与买不起电脑、无网络连接群体之间的差距，以及有能力参与数字驱动经济的群体和无能力参与该发展趋势的群体之间的差距。

工作稳定性下降

如本文分析所示，疫情使原本就入不敷出的群体不得不寻找更加非正式和不稳定的工作。疫情暴发之前，尽管临时工占比有所增加，但有些国家的正式就业未出现增长，甚至还呈现出下降趋势。疫情可能会扭转这一趋势。非正式工作岗位可能会降低发展中经济体的失业率，但这些工作安全性差、生产率低且薪资少。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被表面数字所迷惑，不能将疫情后失业率的下降误认为是经济复苏。

国际劳工组织预估，由于疫情导致劳动时间缩短，全球劳动收入在 2020 年前三个季度同比减少了 3.5 万亿美元。疫情从单纯的卫生危机演变为健康危机和经济危机，加剧了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员工的恐慌。

对劳动者而言，风险远不止立即失业和招聘冻结那么简单。更严重的危险在于，企业将不再倾向于建立长期稳定的员工队伍，而更愿意雇佣更廉价的零工、临时工或合同工。

当劳动力市场能够以更有效的方式配置资源时，那这种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就是有价值的。但是，生产效率低和工作环境恶化带来的灵活性（发展中经济体目前的情况），对劳动者和整个社会而言，都弊大于利。

从事非正式工作的劳动者和合同工以及个体经营者通常无法通过雇主获得社保，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疫情等突发情况的冲击。非正式就业的增加浪费了宝贵的生产潜力，削弱了消费能力并阻碍了经济的全面发展。

解决方案

政策制定者必须制定怎样的政策以应对以上趋势，同时减轻其负面影响？

第一，政策制定者必须认识到，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并不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就业岗位。首要任务必须是实现有益就业的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推动能够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并提高生产率的行业（如基础设施）的发展。此外，还需要增加对生产率日益提高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投资，并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如从服装的装配到全包装生产转变，或从自给自足的农业到食品加工转变。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应提高薪资。

第二，各国政府应抛弃“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的观点。从贫困劳动者的角度来看，该观点或许是正确的，但对经济发展毫无意义。质量低下的工作加剧了不平等，浪费了生产潜力并减少了总需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经济发展。因此，政府必须克制冲动，不再去不加甄别地削弱劳动法规并假装这是为了企业好。制定适当的最低工资、社会保障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包括求职援助和学徒计划）有助于提高生产率，并在困难时期稳定消费。

第三，各国政府应认识到，技术就像从瓶子内破封而出的精灵，聪明且不会受骗，但政府可

以对其进行监管。换言之，可以要求运营数字平台的科技公司在数据共享和透明度方面，将公众利益置于商业利益之上。在此类劳动平台上签约的劳动者应有权享受公共福利和服务。政府应有权访问此类数据，以便在掌握实施情况的基础上做出决策。此外，还应更加严格地执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限制大型企业和成长企业获得更多的权力。政策制定者应调整企业税制，尤其是从事寻租和劳动套利的高科技公司的税制，以将非正式工和合同工纳入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各国政府应抛弃“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的观点。

第四，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崛起和人口变化要求对人力资本的改革升级进行投资，以便使青年人得到适当的教育培训，提升其就业能力。此外，由于新冠疫情改变了经济格局，为有些行业创造了发展机会，但同时也削弱了某些行业的发展能力，因此，政策制定者必须帮助劳动者进行调整和再培训，以适应这些变化。

最后，仅关注眼前、仅提高效率而不增强经济韧性，只会导致经济体变得更加脆弱。政府在卫生、教育、公共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方面的投资都证明其价值所在。财政和货币刺激措施亦如此。尽管这些项目在经济繁荣时期似乎效率低下，但它们提供了必要的空间，使政策制定者能够在不确定时期迅速做出反应。^[FD]

萨比娜·德万 (SABINA DEWAN) 现任国际智库 JustJobs Network 的总裁兼执行董事，该智库致力于在全球创造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埃克哈德·恩斯特 (EKKEHARD ERNST) 是国际劳工组织宏观经济学家，主要研究发展趋势和政策对就业、工资和不平等的影响。

未来的就业

在自动化变革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有些工作岗位将消失，同时也会出现一些新的工作岗位。

萨迪亚·扎希迪

就在全球就业形势的关键时刻，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2020 年未来就业报告》。该报告是世界经济论坛第三次发布的《未来就业报告》，其根据对世界各地商业领袖和人力资源策略师的调查，描绘了未来的工作与技能格局，跟踪了变革脚步和前进方向。今年，该报告将在更广泛的长期技术趋势的背景下，说明疫情对就业造成的影响。以下为该报告所述的五项主要结论。

1 受新冠疫情影响，劳动力自动化发展速度超出预期，未来五年内将有 8500 万个工作岗位被取代。自动化对人工的取代与新冠引发的衰退相叠加，对劳动者造成了“双重冲击”。由于企业采用了新技术，这将在 2025 年前使工作任务、职位和技能出现变革。约 43% 的受访企业表示，随着技术应用程度的提高，它们将会缩减劳动力规模；41% 的企业计划扩大他们对承包商的使用，以完成任专门的工作，而 34% 的企业将继续扩大员工规模。5 年以后，雇主基本将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平均分配工作。

2 机器人革命将创造 9700 万个新工作岗位。随着经济和就业市场形势的

不断变化，技术领域（如人工智能（AI））和内容创造（如社交媒体管理和内容）相关的“关怀经济”等多个领域将出现新的就业岗位。新职位的兴起，既反映了绿色经济相关职位需求的增加，反映了数据和人工智能经济的前沿作用，也体现了工程、云计算和产品开发等领域的新工作。新职位凸显了人类能够在关怀经济、市场营销、销售和制作等领域，以及需要具备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才合作的才能等职位中维持相对优势。

3 到 2025 年，分析思维、创造力和灵活性将成为需求最大的顶级技能。企业认为，在未来几年内，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对企业的重要性将继续提高，尽管之前的《未来就业报告》也一直这么强调。今年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中的自我管理方面的技能，如主动学习、韧性、抗压能力和灵活性。通过与 LinkedIn 和线学习平台 Coursera 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细节数据，跟踪未来所需的专业技能类型。

4 最具竞争力的企业将致力于提高其员工的技能。未来五年料将维持相关



职位的员工中，近 50% 的人需要接受核心技能再培训。调查还显示，公共部门需要提供更有力的支持，对面临失业威胁或已失业的工人进行再培训和技能提升。目前，只有 21% 的企业能利用公共资金开展技能再培训项目。公共部门必须实行激励措施，鼓励对就业市场和未来就业进行投资，为失业工人提供更有力的社会保障；并解决教育和培训体系中久拖未决的一些问题。

5 远程工作将长期存在。约 84% 的受访雇主计划快速实现工作流程的数字化，包括大幅增加远程工作的比例。雇主们表示，44% 的员工有望实现远程办公。但是，78% 的企业领导者预计远程办公会给员工的生产效率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很多企业正在采取措施，帮助员工适应新冠疫情催生的远程办公模式（见表 1 和图 1）。**FD**

萨迪亚·扎希迪 (SAADIA ZAHIDI) 现任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新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表 1

“新生”职位和“消失”职位

未来五年内，有些职位需求将会激增，而有些职位将会逐渐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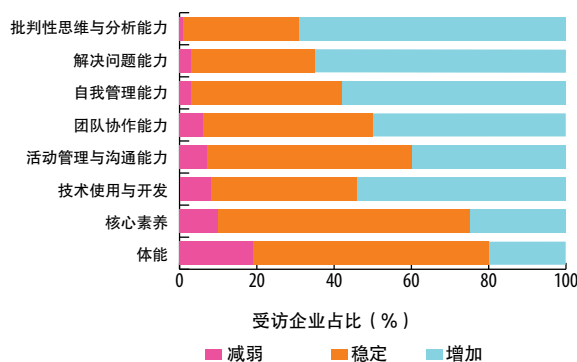
需求日渐增长的新职位		逐渐消失的现有职位	
1	数据分析师和科学家	1	数据录入人员
2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专家	2	行政和执行秘书
3	大数据专家	3	会计、簿记和工资办事员
4	数字营销和战略专家	4	会计师和审计师
5	自动化过称专家	5	装配和工厂工人
6	业务发展专业人员	6	商业服务和行政管理人员
7	数字转换专家	7	客户信息和客户服务工作者
8	信息安全分析师	8	总务和运营管理人员
9	软件和应用程序开发人员	9	机械师和机械修理工
10	物联网专家	10	材料记录和库存办事员
11	项目经理	11	金融分析师
12	商业服务和行政管理人员	12	邮政服务办事员
13	数据库和网络专业人员	13	科技产品批发和制造、销售代表
14	机器人工程师	14	客户经理
15	战略顾问	15	银行柜员及相关职员
16	管理和组织分析师	16	上门销售、街头小贩
17	金融科技工程师	17	电子和电信安装和维修人员
18	机械师和机械修理工	18	人力资源专家
19	组织发展专家	19	培训与发展专家
20	风险管理专家	20	建筑工人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未来就业调查》。

图 1

调整优先性

雇主表示，技能组合的相对重要性正在发生改变，有些技能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而有些则日渐衰弱。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未来就业调查》。



支持年轻一代

年轻人深受疫情冲击，
但他们也可以推动全社会予以积极应对

每一代人都会面临决定性的时刻。当他们批判当下并为创造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时，意味着这正是他们要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关键时刻。对于当今的年轻人（千禧一代和所谓的“Z世代”）来说，眼下就是他们的决定性时刻。许多尚未走出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年轻人再次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包括教育中断、生活艰辛、

深陷焦虑和抑郁。虽然处境困难，年轻人们并未因此而放弃。众多年轻人作为志愿者、社会企业家和思想家踊跃奋战在各个角落，为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和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而努力。

来自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塑造者网络”的四位年轻领袖分享了他们这代人在应对疫情及帮助各个群体战胜疫情的举措。



戴维·沃尔科特，
牙买加金斯頓

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去12年之后，新冠疫情席卷全球，再次给人们带来了沉重打击。尽管加勒比地区地处热带，土地面积狭小且边界易于管理，但是我们的医疗和经济体系仍然非常脆弱，我们正面临着威胁年轻一代未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冲击。疫情触发了使人们感受到了未来的不确定性和财务的不稳定，对千禧一代而言尤其如此——他们正通过教育和就业，向财务独立的人生阶段过度。

加勒比地区的年轻人攀爬财富阶梯的挑战不断增大，而疫情加剧了这一挑战。劳动力市场萎缩，留学回国以及在当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加勒比千禧一代即使是出身名校，也仍为找工作而四处奔波。

远程学习的学生们面临重重困难，包括教育中断的危机。尽管教育机构已尽全力解决相关困难，但是低收入群体的学生仍受到严重影响。

我们集体幸福感的明显恶化，也令人在上述挑战外雪上加霜。深陷孤独和身心俱疲，过度使用社交媒体软件，遭遇家人的不幸离世等问题，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深受抑郁和焦虑等心理问题的困扰。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使很多陷入财务困境的人们更为困顿。

虽然面临重重困难，但加勒比地区的年轻人积极投身志愿服务，并参与公共和私人部门的抗疫工作，这彰显了他们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本区域的决策制定者必须利用疫情创造的机会进一步提升年轻一代的能力，让创新与进步成为加勒比地区人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要实现这一愿景，就要求增加投资，使年轻人能够投身于创建更美好的新世界，并实施促进在线学习和远程就业等政策举措。

很多人面临财务困境，而对不确定未来的担忧使他们雪上加霜。

在全球疫情影响年轻人成长轨迹的情况下，加勒比地区的当局应制定政策，满足迅速增长的心理健康需求，为本地区年轻人提供帮助。当我们准备建设全新的加勒比地区时，政策支持能够让今天的奋斗成就明日的辉煌。

戴维·沃尔科特 (David Walcott) 是一名医生，也是 NOVAMED 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合伙人，该公司致力于在新兴市场推广创新性医疗保健解决方案。



蒂芙尼·于，
美国旧金山

尽管美国是全世界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但美国也是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

此外，美国还面临种族紧张加剧、飓风和破纪录的山火频发以及政治两极分化等问题和矛盾。多重危机和社会矛盾叠加导致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危机，给年轻人（尤其是深陷多重困境年轻人）造成了沉重打击。

疫情使数字鸿沟这一问题被凸显出来。随着教学和工作都转移到线上，许多年轻人不得不在没有互联网和笔记本电脑的情况下度过异常艰难的生活。

疫情正在加剧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麦肯锡公司的研究表明，疫情对美国的非洲族裔造成了更严重的打击，使其遭受了从死亡到破产的

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对绿色经济复苏的讨论感到振奋，对全球碳排放的减少感到乐观。

一系列冲击。教育、学习和就业中断让年轻人步履维艰。

疫情给年轻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损害。居家令增加了人们日益增长的心理压力。年轻人只能独自面对创伤和沮丧。保持社交距离和隔离措施加剧了孤独感、焦虑感和压力感。

虽然如此，疫情期间，我们也学会了保持灵活、提高适应能力并做到坚韧不屈，尤其是年轻人对社会变革充满了希望。

我们常说未来属于年轻一代。因此，我们应确保年轻人享有足够的发言权，有能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此外，我们还需要承认自身可能导致多重压迫的身份因素，包括我们的种族、性别、性取向、残疾或此类情况的组合。本着这种精神，我想向政策决策者提出三条建议：

- 在市政委员会或理事会中，至少吸纳一名年轻人作为代表，参与解决方案的制定过程。
 - 为年轻人提供硬件设备和网络连接，加大对小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投入，以便年轻人能够获得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 投资于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和整体幸福感，在学校教授年轻人以同情之心倾听他人的技巧，并确保所有需要心理健康支持的人都能获得帮助。
- 让年轻人参与解决当前危机。

蒂芙尼·于 (Tiffany Yu) 是旧金山的一名社会企业家，她致力于增加跨部门的残疾人代表。她还是 Diversability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并在旧金山市长残疾委员会任职。



阿什利·史特勒·琼斯，
澳大利亚堪培拉

在经历了持续数月的森林大火后，我在堪培拉的所在社区刚刚度过了两个月的平静生活，紧接着便出现了更严峻的挑战：新冠疫情。与森林大火不同，疫情在全世界引发了恐慌和不确定性。

疫情对弱势群体（包括年轻人和老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已存在健康问题的人们以及移民身份不确定的人们）的打击尤其严重。疫情使全球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恶化，因此要创建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广阔太平洋地区的年轻人也面临诸多与疫情相关的挑战。疫情加剧了就业和财务不安全感。各国政府正在努力恢复就业市场，但在遭受全球经济衰退严重打击的行业，年轻人仍将处于失业状态。

许多年轻人（尤其是处于社会经济底层的年轻人）由于缺乏在线学习所需的设备和稳定的网络，可能会受到教育中断的影响。社区组织和盈利性组织举办了在线讲习班，帮助人们提升技能来增加收入，但是许多年轻人无法参加此类讲习班来获得技能。此外，疫情还导致了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被打乱的日常生活、不确定性、隔离和封锁带来的孤独感加剧了焦虑和抑郁。

然而，变革与机会并存。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对绿色经济复苏的讨论感到振奋，对全球碳排放的减少感到乐观。同样，许多年轻人趁机创业，对所在社区进行投资。借此机会，我发起了一项名为“增强我们话语权”的倡议，帮助来自不同背景的女性和不熟悉计算机的青年来提高其能力，使他们成为公共决策的领导者。该倡议催生了一个活跃的网络社区，它们时刻准备站在积极变革的最前沿。

疫情期间，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塑造者网络”一直在识别最需要帮助的人群，为他们提供食物并写信鼓励他们。我非常荣幸成为该团队的一员，能够在迅速应对疫情的同时，思考如何为所在社区提供支持。新冠疫情仍将是年轻一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但我为自己是努力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年轻人而深感自豪。

阿什利·史特勒·琼斯 (Ashleigh Streeter-Jones) 是一位跨性别领域的社会活动家，她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跟年轻人打交道，并致力于为他们争取到一席之地。



哈马德·阿尔玛迈德，
巴林麦纳麦

世界上的年轻人也许不会遭受新冠疫情给健康带来的最严重影响，但疫情导致的经济冲击使初入职场年轻人的职业生涯陷入瘫痪，并中断了全球众多年轻人的教育。巴林王国在疫情暴发初期就预料到了这种连锁反应，并积极致力于相关工作，

以保护巴林的年轻人免受疫情造成的最严重影响。

巴林政府基于以往经验并冷静行动，努力保护其公民和居民的健康，并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要在这二者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就需要灵活的基础设施，其需要能对快速变化的形势做出响应。巴林的年轻人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出现国内首例确诊病例之前，巴林便已成立了“国家抗击新冠疫情特别工作组”，使各级政府能够及时应对疫情。在领导特别工作组核心团队的过程中，我与来自不同背景和专业领域的年轻人一起工作，我被他们的热情和创造力所折服。

巴林政府许多宝贵的解决方案都是特别工作组中的年轻人提出的，包括在闲置的停车场设立免下车检测站，将大巴改装为移动新冠检测点等。此外，巴林青年还在整个特别工作组的许多工作中（包括联络追踪团队和检测计划团队）担任了重要的领导角色。

在巴林实施疫情遏制战略期间，特别工作组中年轻成员的创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巴林疫情呼叫中心的志愿者到特别工作组核心团队的主管和医生，不屈不挠的巴林年轻人在最困难的时刻证明了自己的价值。我相信，巴林年轻一代将引领国家经济复苏和繁荣。FD

哈马德·阿尔玛迈德 (Hamad AlMahmeed) 是巴林第一副总理办公室研究和公共政策副部长，目前是巴林疫情抗击作战办公室的负责人。

如何创建更平等的美国社会

一位领先的进步论经济学家在当前关键时刻提出了美国经济的改革措施

希瑟·布希



新冠疫情无情地揭露并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诸多不平等现象，将美国置于其他系统性冲击的危险边缘。为遏制疫情蔓延，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美国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消除这些不平等现象。否则，美国经济很可能将深陷衰退泥潭，而且更有可能因健康或其他原因再遭重创，导致数百万人再次失业，使许多家庭陷入恐慌、饥饿和持久的经济创伤。

在疫情来袭之前，美国经济正处于 2007 年 12 月大衰退后漫长的十年复苏期。但是，并非所有的美国人在经济复苏中的经历都相同。最富有的 1% 群体一如既往的富有，他们早在 2012 年便

已重新拥有了在大衰退中失去的财富。然而，截至 2020 年 3 月，美国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家庭仍然没有完全重获他们在大衰退中失去的财富，许多家庭（尤其是非洲裔）再也未能重获失去的财富。即使在强劲的复苏中，美国仍面临严重的经济和种族不平等问题。

美国工薪阶层及其家庭的明显差异使得当前的经济复苏既不是“U 形复苏”也不是“V 形复苏”，而呈一种类似于“横着的 Y 形”的不均衡横向复苏：因股市复苏受益或受雇于未受到经济衰退影响的群体位于向上的分叉上；处于向下分叉的群体可能需要挣扎许多年。此外，在上下两个分叉上，也存在着种族和阶级的明显差异。当前的衰退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彻底解决这些不平等问题的机会，决策者可制定能够从根本上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变革性政策，以创建一个更加健康和更具韧性的经济体，从而实现更强劲、更稳定、更广泛的经济增长与繁荣。

无处不在的不平等

许多美国工人及其家庭之所以处于众多不平等中的不利一方，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导致的：政策制定者长期严重依赖市场来完成本应由政府完成的工作，而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有些被写入法律）使得政策制定者对其带来的不公正和经济影响视而不见。

本文将寻找导致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具体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市场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保守派经济学

家提出主张，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实现持续增长和民众福祉的唯一途径。此后，除了少数例外，这种意识形态一直主导着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但事实证明，这种政策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此外，本应中立和公平的市场管理规则，实际上已将经济风险从企业和富人转嫁给了中低收入家庭。疫情进一步凸显了这种情况，即疫情导致大多数低收入劳动者失业，或不得不从事易被感染并传播病毒的工作。

减税和薄弱的公共投资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总统 2017 年实施减税新政的主要受益人实际上是富人群体，该政策只是数十年来一直主导美国财政政策的减税理念的一个最新体现。这些举措反而减少了国家能够用于行使基本政府职能和重要公共投资的资源。因此，美国公共投资占 GDP（美国一年中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价值）的比重降至 194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削弱劳动者的权力 多年来，不利于工会的法院判决和行政裁决，逐步削弱了美国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好福利、更安全工作环境的能力。在 27 个州中，工作权利法增加了组建工会的难度。由于雇主占据上风，工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劳动者安全受到影响，这在疫情期间尤为突出。

行业集中度 美国在反垄断政策及其执行中的做法，使得美国各地的行业集中度越来越高，这使大型企业掌控了市场力量，从而可以开展定价、消灭竞争对手、压低工资并阻碍创新。更糟糕的是，相关证据表明这些政策一直在抑制企业的投资。疫情中，有些企业蓬勃发展，而小企业则在生存边缘挣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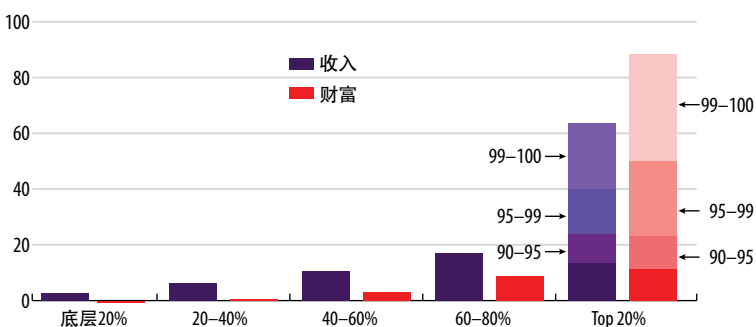
衡量经济规模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经济不平等开始加剧之前，GDP 增长是衡量大多数美国人福祉的合理可靠指标。但是，随着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到接近 1920 年的水平，GDP 增长带来的好处集中流向最前 10% 的最富有群体（见图 1），而绝大多数群体的收入增速低于 GDP 增速，有些人的收入甚至根本没有增长，所以，GDP 主要反映了最富有群体的情况。因此，随着未来几个月

图1

财富集中

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分配偏向最富有的5%的人群。

（2016年总收入或总财富的五分位数占比（%））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联邦储备委员会《2017年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的相关数据估算。

注：收入占比根据收入分配的五分位数计算，而财富占比根据财富分配的五分位数计算。

GDP 的复苏，其将向政策制定者发出错误信号，使其误认为普通美国民众的情况正在改善。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 疫情导致的衰退对人们造成了不同的健康和经济影响，这使美国由来已久的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更加严重。非洲裔家庭的收入中位数是白人家庭的 59%，所有种族的男性和女性中，男性每挣 1 美元，女性只能挣 81 美分（中位数）。不同群体在职业中相互隔离，其结果显而易见：医疗护理和服务人员奔波在疫情最前线，尽管这些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女性和少数族裔所占比例极高），但其中有些工作很难享受带薪病假或雇主提供的健康保险等福利。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数十年来的失败政策所导致的。这种失败政策，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而不是基于实际情况而制定的。过度追捧市场的错误经济理念削弱了政府机构的能力，减少了对公共机构的资金投入，导致了经济的过度集中，削弱了劳动者的权力，也造就了自由放任的劳工规则带来的歧视性影响。政策抉择在建立市场结构方面发挥着明确且持久的作用。

要使美国经济彻底转型，政策制定者们就应明确认识到市场无法发挥政府的职能。

建立更强劲、平等的经济

要使美国经济彻底转型，政策制定者们就应明确认识到市场无法发挥政府的职能。

首先，必须完全根除新冠疫情。这是当前的第一要务，是确保公众健康和促进美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除此之外，要实现强劲可持续的经济复苏和惠及全体民众的经济增长，还需要美国政府解决由来已久的难题，这包括：极其昂贵的医疗体系无法为数百万人提供足够医疗保障；教育体系不能消除不平等，反而予以维持；大多数家庭的经济状况很不稳定；以及气候变化等问题。

要解决前述每个问题，都需要大量的公共投资。虽然目前暂时无须担心由谁为此买单，但是国家应主要（或完全）针对富人大幅增税，以着手为解决有关问题筹集资金。此外，美国政府应针对储蓄或海外财富（不包括经济投资或用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财富）征收巨额财富税（见图1）。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全力解决行业集中度问题，因为其导致了行业垄断（单一或少数买家或雇主），压低了工人工资，且对小企业生存构成威胁——而小企业是创新和经济活力的源泉。要解决行业集中度问题，首先必须确保经济衰退和旨在帮助企业渡过危机的计划不会加剧该趋势。到目前为止，联邦政府在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中，对大型企业的援助规模远远超过对小企业的帮助。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保联邦政府的资金被用于生产性活动，从而支持劳动者和客户的有效活动，而不是用于回报富裕的股东。应禁止受助企

业发放股息和进行股票回购，要求银行在疫情期间暂停资本分红，以促进信贷支持实体经济。

要解决行业过度集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加强美国的反垄断执法，目前的执法力度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此外，还应完善反垄断法，尤其是关于兼并和排他性行为方面的规定。立法者应考虑建立数字监管机构，以执行隐私法并鼓励数字市场的竞争。

美国政府还应识别出复苏政策使哪些人受益，哪些人未能获得帮助，以及需要进一步采取何种其他措施。由于GDP总量无法反映该问题，因此必须在各个层次上对收入进行分类，以衡量每个群体的经济状况是否有所好转，这将为美国政府制定复苏政策奠定基础。

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与种族不平等问题密切相关。“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传递的明确信息表明，美国有色人种从来都不相信政府会为其利益行事。因此，美国政府必须努力确保低收入的非裔、拉丁裔和美洲原住民能够在经济中培养和运用他们的才能和技能。

征收财富税是解决种族主义问题的一种方法，因为美国白人拥有的财富比例过高。但是，要彻底解决种族不平等问题，财产税的收入必须能惠及大多数穷人。税收收入必须用于最急需的投资，例如在有色人种社区进行新冠病毒检测和治疗，明确制定并逐步推行支持低薪工人和护理人员政策，并帮助少数族裔拥有小企业。否则，其将进一步加剧美国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

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是，政府未制

定国家带薪家庭假和病假的有关政策，也未出台国家方案以确保家庭能够获得低廉的优质育儿和学前教育。无法享受带薪休假、育儿假或负担不起托儿所教育的家庭别无选择，只能牺牲自己的工作——而且经常是女性做出牺牲。为了实现这两个目标，国会已经开始讨论相关立法工作，下一届国会则应予以认真考量。

乐观的理由

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有能力制定相关政策，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的变革。直到不久前，政策制定者及百姓们茶余饭后讨论的一些问题，如新冠疫情、严重衰退、“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最近

的总统大选，还很可能仅沦为公众讨论的边缘问题。但今天，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

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深受根深蒂固的党派偏见以及宪法和选举制度的困扰，这使得出台政策推动变革比阻碍这些政策的通过要难得多。但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仍然相信，美国可能正处于转折点，那些制定和倡导进步政策，力图减少不平等现象并建立强劲、稳定和广泛增长的人们，终会占得上风。 **FD**

希瑟·布希 (HEATHER BOUSHEY) 现任华盛顿公平增长研究中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且著有《松绑：不平等如何制约我们的经济，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一书。可关注她的推特账号：@HBoush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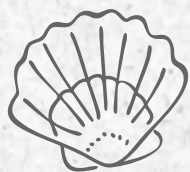


多希望 你能来旅游

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
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最大

亚当·贝苏迪





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全球旅游业收入已占全球 GDP 的 10%，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 3.2 亿个工作岗位，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

1950 年喷气式飞机问世之前，只有 2500 万人出国旅行。到 2019 年，全球旅游人数已达 15 亿。对许多经济体而言，旅游业已成为其规模最大的支柱产业。

新冠疫情是互联互通新时代出现的一场规模罕见的全球性疫情。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UNWTO) 的相关数据显示，疫情已导致 1 亿人失业，其中很多位于中小微企业，它们雇佣的女性雇员占比更高，占旅游业劳动力的 54%。

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受疫情负面影响的时间可能比其他经济体长得多。旅游业这种接触密集型服务业受疫情打击尤为严重，在人们普遍认为可安全出行之前，旅游业仍将苦苦挣扎。

加勒比共同体 (CARICOM) 秘书长欧文·拉罗克 (Irwin LaRocque) 在 9 月份举办的视频会议中表示：“我们无法摆脱当前的困境。”

从加勒比海、塞舌尔、毛里求斯和太平洋等地的白色沙滩，到曼谷的小巷，再到非洲广袤的国家公园，各国在努力遏制疫情传播的同时，使出浑身解数吸引游客。从吸引可以在游艇上隔离的超级富豪，到邀请朋友居住长达一年并在享受热带风光的同时远程办公，各国有着各式各样的解决方案。

全球旅游业收入预计要到 2023 年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疫情后旅

游行业的持续研究表明，今年上半年，全球旅游人数同比下降了 65%，自 4 月以来，全球旅游业几乎陷入停滞——而全球旅游人数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仅下降了 8%，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也仅下降了 17%。

在 10 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2020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4.4%。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击。非洲和加勒比海等旅游业依赖型国家的实际 GDP 将萎缩 12%。2020 年，斐济等太平洋岛国的实际 GDP 将骤降 21%。

此外，疫情造成的经济冲击并不限于最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在美国夏威夷州，到 8 月份已有 1/6 的人已失业。旅游业占佛罗里达州经济收入的 15%，该州官员表示，佛罗里达州旅游业可能需要三年才能恢复。

在二十国集团 (G20) 成员国中，酒店和旅游业的就业人口平均占总就业人口的 10%，其收入平均占 GDP 的 9.5%，而在意大利、墨西哥和西班牙，旅游业收入占 GDP 比重高达 14%。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表的文章指出，如果经济活动中断 6 个月，可能使所有 G20 国家的 GDP 直接减少 2.5% 至 3.5%。

管理收入差距

与许多其他旅游业依赖型国家一样，巴巴多斯和塞舌尔的旅游业因疫情几乎陷入停滞。在成功阻断新冠疫情在当地的传播后，政府当局于 7





集资金，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括现金转移支付、赠款、税收减免、薪资补助、贷款担保等）提供融资，以减轻旅游业收入暴跌对家庭和企业的的影响。此外，银行在一些情况下也允许借款人在一定期限内暂停还本付息。有些国家将工作重点放在资助非正规经济部门的劳动者上，因为他们往往集中在旅游行业，在疫情面前十分脆弱。

麦肯锡公司针对旅游业的分析显示，旅游业需要多年才能恢复到 2019 年的水平，为此需要实验新的融资机制。

麦肯锡公司分析了 24 个经济体的一揽子刺激方案，这包括投向旅游业的 1000 亿美元直接援助，以及投向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其他行业的 3000 亿美元援助。最直接的刺激措施是向中小企业和航空公司提供赠款、债务减免和资金援助。麦肯锡公司建议采用新方法支持旅游业复苏，包括对处于同一细分市场酒店（如处于同一片海岸上的酒店）建立收益共享机制，以及为旅游业相关企业提供政府支持的股权融资。

发展方面的挑战

旅游业是许多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经济的一条发展途径，而新冠疫情使其重要性得以体现。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旅游业发展一直是缩小穷国与富国之间差距的主要驱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表示，在 1990 年至 2019 年，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平均人均 GDP 增长率为 2.4%，比本地区不依赖旅游业的国家快得多。

依赖旅游业的小型国家的发展方向受到限制。小型岛屿国家几乎没有（即使有也很少）其他行业来转移劳动力和资本。

例如，塞舌尔在新冠疫情期间受益于金枪鱼出口量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旅游业的损失，但是这些额外收入仍然只是旅游业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塞舌尔政府实施了一项计划，向旅游业失业者支付工资并提供再培训机会。

与此同时，巴巴多斯政府正努力维持其社会支出，并重新确定资本支出的重点方向，以此（至少

月决定重新对国际游客开放。尽管如此，8 月份的入境人数比前几年骤降了近 90%，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几近枯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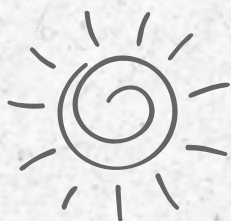
疫情暴发之前，巴巴多斯的经济基本面良好，这得益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支持的经济改革规划，其帮助巴巴多斯稳定了债务，积累了储备，改善了财政状况。疫情暴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巴巴多斯的中期贷款便利增加了约 9000 万美元（GDP2%），以帮助其应对因旅游业收入锐减和新冠疫情相关支出增加而导致的财政赤字。

巴巴多斯总理米娅·莫特利（Mia Mottley）的高级技术顾问凯文·格林尼奇（Kevin Greenidge）表示：“疫情持续时间越长，我们就越难维持下去。先前我们在改善经济基本面方面取得了成果，现在我们在实施政策时让这些成果付诸东流。”

处于世界另一端的塞舌尔，在疫情暴发前经济形势也与巴巴多斯类似。但塞舌尔也面临着在缺乏重大支持的情况下恢复中期财政可持续性的挑战。在疫情暴发前，塞舌尔政府已重建了国际储备并改善了财政状况。尽管如此，由于旅游业收入骤降，且与新冠疫情相关的支出增加，持续蔓延的疫情已使这个印度洋岛国遭受重创。

“要判断疫情是否会带来永久性冲击，以及其将如何影响旅游业的发展，现在还时尚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塞舌尔代表团团长波利亚娜·扬切瓦（Boriana Yontcheva）说：“由于旅游业复苏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实施创新性的结构性政策，以适应新常态。”

在全球各地，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正努力筹





在短期)在农业、基础设施等非旅游部门创造就业。

加勒比海酒店和旅游协会预测,疫情将导致整个加勒比地区正在规划或建设的30,000个新酒店客房中的60%无法如期完工。

尽管如此,这场危机仍被视为在中长期改善旅游业的一次机会,这将通过提高数字化程度和改善环境可持续性来实现。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鼓励各国支持工人培训来培养其数字技能,从而利用大数据、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此外,应利用旅游业恢复的机会,提高旅游业对能源和水的利用效率,改善废品管理,实现食物来源可持续。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UNWTO)秘书长祖拉布·波罗利卡什维利(Zurab Pololikashvili)表示:“在这个雇佣了全球1/10人口的行业中,利用创新和数字化、融入当地价值并为所有人(尤其是女性和最弱势群体)创造体面的工作机会,这将成为旅游业复苏的重要推动力。”

适应新常态

2020年下半年,由于封锁和防控措施的影响有所缓解,各国开始寻求平衡。

泰国、塞舌尔和其他国家批准了相关项目,允许“低风险”国家游客在满足特殊隔离要求后入境。斐济总理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在推特上宣布,斐济已启动了“海上蓝色通道”项目,允许游艇游客进入指定港口,并在释放其“巨大的经济效益”之前,在海上完成隔离。圣卢西亚要求游客入境前提供7天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澳大利亚启动了“旅行安全区”项目,允许新西兰入境澳大利亚人员无需检疫和隔离。加勒比共同体建立了“区域旅行安全区”,取消对来自同一区域国家游客的检测和检疫要求。在远程办公的新时代,巴巴多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安提瓜、巴布达、阿鲁巴岛和开曼群岛等国家提供了长期工作许可(一些地区的许可长达12个月),吸引国外游客前来远程办公,同时拉动本地消费。

从2013年到2018年,日本的国际游客数量

增长了3倍。2020年10月底,日本开始取消对某些国家游客的限制。为促进疫情后旅游业的反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报告建议日本政府继续放宽签证要求,将游客从市中心吸引到人口较少的地区,并通过改善劳动力资源和旅游基础设施来推动旅游业的复苏。

世界旅行和旅游理事会在一份关于旅游业未来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新冠疫情下,游客已将关注点转移到国内游或自然风景及户外目的地。报告称,旅游业的恢复将主要从“风险厌恶程度较低的旅行者、较早适应新环境者开始,这包括从冒险旅行者、背包客到冲浪者和登山者等旅游者”。

现在判断疫情是否会给旅游业带来永久性的冲击还为时尚早。

休闲游将引领旅游业和出行部门的复苏。作为酒店和航空公司收入的重要来源,商务旅游可能出现永久性变化,或者可能会根据出行距离、出行原因和所处行业分阶段恢复。

最后,旅游业的复苏很可能取决于许多人的个人决定,他们会在感染风险和旅行必要性之间做出权衡。在依赖旅游业国家的支持下,私人部门正在为各种旅游产业制定全球规则,包括呼吁在机场进行更快速的测试,以提振人们对旅游的信心。

圣卢西亚总理艾伦·查斯塔内特(Allen Chastanet)在9月份召开的视频会议中表示:“事实在于,人们现在对旅行的想法感到不安。我们还没有出台相应的规则,让人们安心出行。”“9·11之后,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安全机构在制定相关规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从而提振了公众对出行的信心。很遗憾的是,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没能这样做。”^{FD}

亚当·贝苏迪(Adam Behsudi)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打造数字经济 新高地

世界需要数字交易的全新治理体系

穆拉特·桑梅兹



命已推动相关技术飞速发展，而目前其发展速度更快。全球 80% 以上的企业高管正在加快布局，推进工作流程数字化并部署新技术。到 2025 年，雇主将在人类和机器之间平均分配工作。

然而，这场革命背后的挑战仍未改变。我们如何在降低风险的同时充分发挥技术的潜力？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整个社会都从中受益，而非仅惠及少数特权阶层？

充分利用数据的力量

数据是释放第四次工业革命潜力的关键所在。数据推动了人工智能、精准医疗、机器人和物联网的发展。因此，数据的使用和保护方式将决定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最终成败。但是要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必须弄清楚以下基本问题：数据的所有者是谁？你能用数据做什么？谁将享受其经济利益？

科技公司的估值已超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规模，由此我们看到了数据的经济价值。如果我们能找到一种透明、平等的机制，在保护数据所有者隐私的同时让数据为个人和组织创造经济价值，则我们不仅可以利用数据的力量来应对卫生、农业、交通、环境等方面的重大挑战，还可以为数据的所有者创造收入。

因此，必须制定具有前瞻性的赋能政策，而非保守的惩罚性政策。为推动数据相关技术的持续发展，我们需要创建全新的数据操作系统（data OS）以完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治理机制。

第一，我们需要重新构想通知和同意机制，允许数据所有者规定其数据可用于哪些用途，可使用多久，以及是否应向其支付使用费。这些规则可以附加到数据集上（就像媒体数字版权管理一样），以防数据遭到滥用。

第二，我们需要就使用各种数据集的应用程序，提供认证机制。数据挖掘算法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可以将其看成一个第四代工业革命的应用

机器人穿梭在医院病房和仓库，用紫外线对房间进行消毒。语音激活和声控设备正在帮助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患者。专业的医疗人员正在使用人工智能（AI）加快诊疗速度。无人机可按需运送血液，将运送时间从几小时缩短至数分钟，同时也减少了浪费。

这些技术共同代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4IR）——近期，计算能力出现爆炸性增长，互联技术使我们的实体世界和数字世界的相互融合。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了大多数社会与技术的互动和使用方式，且在不受任何限制或无任何指导方针约束的情况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快速发展。

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之前，第四次工业革

程序商店，其由值得信任的机构管理，该机构可以对这些应用的所有者进行认证，确认其遵守新的许可协议和限制条款。

第三，我们需要透明的数据估值机制。数据本身并不具有经济价值；与糖、棉花或咖啡等大宗商品类似，数据的价格受供需关系的驱动。我们可以通过该交换机制明确声明数据为可交易资产，利用市场力量根据需求，就数据的特定用途进行定价。然而与大宗商品不同的是，数据并非一次性资产，它可以重复用于多种用途。

第四，我们需要建立跨境数据流动和数字汇款机制。各国可以起草双边条约，约定就彼此同意的用途跨境共享数据，通过灵活且安全的机制整合数据资产。此外，还可以通过数字化方式促进跨境支付，确保及时向所有者付款。数据所有者在获得收入时纳税，而数据使用者在其辖区内使用数据时需纳税，从而形成公平透明的税收体系，并为政府创造了新的收入来源。

这四个层面不仅可能为个人带来持续的收入，还可以让持有大量数据的企业使用透明的盯市计价机制，引入一种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受益的资产负债表。

该系统能够利用逆向工程对各种故障进行排查，从而避免其发生，同时也提醒我们警惕潜在风险，制定适当的应对措施，以确保未来不会发生相关风险。如果设计合理，这种新的操作系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并应对未来的挑战，同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以上前景并非遥不可及的梦想。我将列举三项案例研究，它们都致力于使用 4IR 技术解决全球最重大的挑战，包括治疗罕见疾病、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以及重建被破坏的信任。但是，正如下文所强调，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拓展 4IR 技术的益处时，我们可能忽略了一些关键问题。

治疗罕见疾病

新数据操作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罕见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全球有 4 亿人患有罕见疾病，远远超过癌症和艾滋病的总和。目前，已确认的罕见疾病约有 7000 种，通常都具有很多不同的症状。

由于在同一国家只有少数人患有相同的罕见病，因此罕见病的诊断往往非常耗时且难以定论，而且缺乏可用的治疗数据。由于无法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数据库，各国对罕见疾病的研究手段严重不足。实际上，某个国家的罕见病患者可能并不知道在另一个国家相同罕见病的诊疗方法。

因此，打造旨在全球范围内收集和共享数据的更加全面的系统，有助于各国和各家医院更快地诊断和治疗罕见疾病。可获得的数据越多，诊疗结果就越好。

未来 5 年内，预计约有 1520 万人接受罕见病临床基因组测试，因此，我们迫切需要评估研发相关系统的潜在好处——该系统应能共享数据，同时确保不会损害个人隐私。我们可采用联邦性质的数据库系统，允许各个自治数据库相互连接（而不进行合并）。联邦数据库的使用者可以通过统一接口访问自愿共享的信息，但是每个数据集仍受本地控制和安全管理。

如果基因组数据政策不完善，将导致相关群体面临风险，即：某些个人或企业将擅自提取基因和生物信息，将其用于自身利益而非公众利益。此外，还存在一种并非由坏人险恶用心造成的风险。人们只是在缺乏数据保护政策和标准的情况下，没有妥善管理其敏感数据。通过制定有关伦理政策、法规和标准，我们可以为科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提供支持，同时又防止数据滥用，从而将该风险降至最低。联邦数据系统包含了数据操作系统的四个要素，并有可能以安全方式提高收益并惠及整个社会。

确保食物的充足供应

关于人工智能的头条新闻经常会突出强调人工智能的危险和包容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就人脸识别技术的道德问题、企业如何确保算法不会延续偏见、自动驾驶汽车如何确保驾驶员和行人的安全等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一场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以应对人类饥饿的革命正在悄然进行中，而数据在防止人类陷入全球粮食危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未来，人类将面临巨大的食物挑战。当前不

我们需要弄清楚三个基本问题：数据所有者是谁？ 你能用数据做什么？谁将享受其经济利益？

可持续的农业实践加剧了土地退化，到 2050 年，全球 95% 的土地都将退化，将有 20 亿人无法获得安全、营养和充足的食物。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对粮食系统进行彻底改革，而 4IR 技术有助于推动这一变革。

有些农业人工智能初创企业正在针对全新的大型数据集训练算法，以提高农场的绩效。例如，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农业新创公司 Prospera 每天从 4700 个变量中收集 5000 万个数据点，然后使用人工智能识别病虫害，同时发掘能够提高产量、减少污染和消除浪费的新机会。

其他公司也正在开发人工智能工具，以加快向人造肉制品的转变。例如，智利食品技术公司 NotCo 和巴西的素食创业公司 Fazenda Futuro 都开发了人工智能工具，通过分析大量的植物数据来找出复制肉类口感和质地的最佳方法。瑞士芬美意公司 Firmenich 在全球率先推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开发的衣物洗护香氛。由于肉类生产几乎占世界农业排放量的 50%，因此向人造肉转变也有望带来巨大的环境效益。

上述案例研究表明，全球企业都在利用 4IR 技术的优势，但在很多地方，数据流动却受到限制，无法跨越国界。人类面临全球性的粮食挑战，要确保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我们必须发挥出人工智能的全部力量，因此，我们需要跨境共享数据并消除数据孤岛。

数据操作系统等此类解耦架构可帮助各国和企业共享其食品解决方案的开发成果，并有可能因数据共享而获得经济利益。如果我们能明确数据所有权（包括使用数据和获得回报的权利），我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些项目。

建立信任

无论是用于诊断罕见疾病还是提高农业产量，信任是 4IR 技术的进步基石。如果共享的数据不被信任，该系统就会崩塌。因此，我们跨境

跨行业共享数据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保数据的真实性。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使用区块链或分布式账本技术——一种防篡改的数字簿记系统。在该系统中，带有时间戳的交易“块”被记录并分布在可访问的数据库中。区块链点对点的安全体系架构、透明性和快速发展的特性（如智能合约和令牌），使其成为一个构建精确和可信政策系统的理想平台。

该系统已经被全球各地的企业和国家使用，以尝试在过去曾面临挑战的领域建立信任。印度初创公司 StaTwig 已试行使用区块链分类账技术来追踪儿童疫苗的交付情况。跨国饮料和酿造公司百威英博在赞比亚试行了该技术，以提高围绕木薯等本地农作物的定价透明度（此前付给农民的报酬一直过低）。哥伦比亚正在探索如何通过区块链改善对公共采购的监督，以根除腐败。

区块链技术目前仍处于发展早期阶段；但事实证明，这是在最需要信任的地方建立信任的最佳途径。如果我们能够证明所使用数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我们就可以在其使用基础上建立并增强信任。

惠及全人类和整个地球

目前，4IR 技术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飞速发展。该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应造福人类和地球。驾驭这场革命需要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人、民间社会、国际组织等所有利益相关者通力合作。

如果政府领导人现在就采取行动，他们就可以保持经济的竞争力并提高国民的福祉。面向未来的技术政策结合新数据操作系统的框架，将有助于建立信任并加速向正确方向迈进。可持续复苏将确保个人能够享受自由而富足的生活，并公平地获得全球化市场的众多机会。FD

穆拉特·桑梅兹（Murat Sonmez）现任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心主任和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

重建 工人权力

与雇主相比，美国工人的权力受到了系统性的削弱，这抑制了美国工人工资的增长

劳伦斯·米舍尔



美国两大政党的政客们现在都承认美国工资停滞不前，且都以“系统被操纵”的说辞搪塞这一问题。有些政客关注的焦点是移民数量，以及他们所认为的与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而有些则关注提高物价并赚取巨额利润的垄断企业。但是，在谁以何种方式操纵了系统这一问题上，政客们却未达成共识。

事实上，正如我与同事乔希·比文斯 (Josh Bivens) 和海迪·希尔霍尔茨 (Heidi Shierholz) 合著且于最近发表的《工资压迫原因分析》一文所述，美国工资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实践和经济政策（或是由于商界和富裕阶层阻挠了相关改革）导致工人权力被系统性削弱。由于工人无法享受应有的权力，造成工资被压低，工资不平等上升，种族不平等也有所加剧。导致工人权力丧失的具体机制在于过度失业、全球化、劳工标准下降及执行不力、集体谈判能力削弱、公司结构变化使工人处于不利地位等。要重建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工资增长模式，首先需要以重建工人权力为中心的新政策。

过去 40 年中，最富有的 1% 和 0.1% 人群的收入分别暴增了 158% 和 341%。尽管整个经济的生产率提高了近 70%，但普通工人的时薪却只增加了不到 12%。自 2000 年以来，劳动力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

下述政策和企业实践全面削弱了大多数工人的议价能力，其累积效应是导致前述工资模式和经济结果的主要原因。

紧缩性政策

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导致了“过度失业”（定义为失业率高于充分就业率）。自 1979 年以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一直担心通胀风险，他们并未拥抱充分就业带来的好处。这种做法造成了过度失业，对中底薪工人带来了严重伤害，尤其是非裔工人。

如果美国在 1979 年至 2007 年期间能保持 5% 的充分就业，则到 2007 年工资中位数将提高至

18% 到 28% (Bivens 和 Zipperer, 2018 年)。联邦和州政府实施的紧缩性财政政策导致了大衰退，使失业率在此后长期高居不下，其带来的侵蚀效应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仅过度失业这一个因素，就导致自 1979 年以来非裔工人与白人工人的工资差距扩大了 9 个百分点。

资本全球化

旨在最大程度地抑制工资的蓄意政策推动了全球化趋势，给非裔和拉丁裔工人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比文斯 (Bivens) 2013 年的研究表明，与低薪国家的贸易往来使未接受大学教育的美国工人薪资下降了约 5.6%——相当于人均每年损失近 2000 美元。其他研究也证明了该结论。

仅由贸易伙伴的技术变革和政治变革驱动的全局化，终究会抑制美国工人的工资增长。但美国的政策失误进一步加剧了此类破坏性影响：未能给失败者提供合理的补偿，也未能提高其国内议价能力；未能解决导致巨额贸易逆差和制造业就业岗位流失的汇率失调问题；通过了保护企业利润却削弱工人经济影响力的贸易协议。这导致美国雇主用进口商品替代了以前由美国工人制造的产品。

工会遭到削弱

确定中等收入工人工资的关键机制是集体谈判，因此工会代表权的削弱一直是抑制男性中等收入工资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加入工会的比例远低于女性）。集体谈判会带来更平等的工资结果，而工资下降会导致不平等加剧，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发表的学术文献中已明确论证了该观点。福汀 (Fortin)、勒米厄 (Lemieux) 和劳埃德 (Lloyd) (2019 年) 指出，工会被削弱可以解释男性工资不平等上升的 29%-37%，能够解释高收入和中等收入男性之间的不断扩大工资差距的 37%，这意味着，工会被削弱导致男性工资中位数每年下降 0.33%。工会被削弱对女性工资不平等的影响较小，其能解释 10%——13% 的整体工资不平等的增加，以



及 13% 的高收入女性的工资不平等的增加。

私人部门工会覆盖率不断下降（从 1979 年的约 23% 下降到 2019 年的仅 7%），主要是因为企业实践和法律判决的变化，它们削弱了工人组建工会和开展议价的能力。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集体谈判的巨大需求并未得到满足：2017 年，近一半的非工会工人希望进行集体谈判，这涉及 5800 万未被代表的工人。

劳工标准下降

劳工标准及其执行在多方面受到削弱，这也抑制了工资增长。

美国在维持适当最低工资标准方面的大溃败，降低了最底层 1/3 劳动者的收入，严重影响了非洲裔、西班牙裔和女性劳动者。尽管生产力翻了一番，但 2019 年联邦最低工资比 1968 年的峰值低了近 25%。最低工资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中低薪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变化。

此外，加班保护也被削弱。1975 年，近一半的工薪族满足加班费的门槛（低于一定门槛的工薪族可自动获得加班费），而到 2014 年，该比例骤降至 10%。

削弱劳工标准的实施力度的下降，可能会导致工人工资被企业窃取，这使工资问题雪上加霜（如果雇主未向工人支付其应得报酬，支付金额低于最低工资水平，或是未支付加班费，工人工资就被企业盗取了）。2016 年，低薪工人因此损失了 500 多亿美元，远远超过了抢劫案中被盗财产的损失。工资盗窃在低薪和移民工人中尤其严重，约占最底层 60% 劳动者总工资的 3%。我们无法估算过去 40 年来遭到窃取的工资总量，但专家认为这种现象目前非常普遍——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与 1979 年相比，因工资盗窃行为导致的工资损失增加了 1.5%-2%。

移民政策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劳工标准真空区。约 6% 的劳动力包括无证工人和外来工人）因雇主适用其市场权力，而无法得到全面的劳动

保护。这些受剥削的移民劳动力的增长，既削弱了美国的工资和就业标准，又对工资构成下行压力。但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表明移民工人抢走了别人的工作，问题的关键是劳工标准和保护措施薄弱，导致移民工人更易受到剥削。

此外，雇主还制定新的协议（工人不得不签署），其限制了工人的就业前景及其向法庭和政府机构投诉雇主的权力。具体而言，此类协议按照雇主的意愿肆意压低工资。例如，竞业协议禁止员工去竞争对手的企业工作，导致 28%-46% 的私人部门员工就业前景黯淡。强制性仲裁条款迫使工人以个人身份（而非集体诉讼的一部分）对歧视指控、违反工资和工时法以及其他事项进行由企业主导的仲裁，使他们无法诉诸法庭。2018 年，56% 的非工会私人部门工人受此类协议的约束。

数百万工人被蓄意误判为独立承包商（实际上是雇员），因此剥夺了他们享受社会保险保护、工作场所保护（反歧视、集体谈判）以及医疗和养老金福利等权利。不仅是 Lyft 和 Uber 等创新型打车平台领域的劳动者，公路运输、建筑和清洁卫生等服务领域的工人也普遍受到此类不平等约束。

企业结构

企业结构的变化改变了企业之间以及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权力和收入。

雇主影响劳动力市场表现、使之利于自身的最明显方法，是所谓的“断裂”。“断裂”是指占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标准和其他机制，对价格和结果进行严格控制的一种国内外包做法。在该过程中，利润重新分配给占支配地位的企业，分包企业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遭到进一步侵蚀。在美国经济中，1/5 到 1/3 存在“断裂”特征，这一比例远高于 40 年前（当时可能仅为现在的一半）。为确定“断裂”的影响力，我们制定了推测性衡量标准：如果将 15% 的就业岗位转移至工资低 15%

的“断裂”企业，则整体工资将下降 2.25%。

大公司因此进一步要求供应商提供更低的报价。威尔默斯 (Wilmers, 2018) 对占支配地位的采购商挤压供应商利润和降低工资的能力进行了量化研究。非金融供应商通过占支配地位采购商获得的收入份额从 1979 年的 5% 增长至 2014 年的 19%，其中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份额从 6% 增长至 26%。威尔默斯估计，该情况导致非金融类公共公司的年收入下降了 3.4%，对中低收入工人的影响肯定更大。

20 世纪 70 年代末，美国国会解除了对航空公司、卡车运输、州际巴士、电信、公用事业和铁路的管制，从而降低了蓝领工人的薪酬。20 世纪 80 年代，9% 的劳动力受到行业解除管制的影响，这削弱了中等收入劳动者的工作岗位，使其薪资大幅降低，也可以解释 1979 年至 1988 年期间男性工资不平等上升近 7% 的原因。

垄断（由少数销售商主导产品市场）和雇主集中（由少数雇主主导就业市场）都会导致工资下降，但此类因素并不会显著抑制工资的增长。

雇主集中主要影响农村地区，但在过去 40 年里似乎没有增长。劳动力收入的占比下降，但不那么明显的是：这是垄断利润的结果，而非非工人权力被削弱导致的。最近经济复苏期间，随着失业率下降，劳动力收入的占比明显上升，这证明受侵蚀的工人权力的作用很大，因为垄断程度并不一定会随着失业率的降低而下降。五大科技公司的巨额利润确实表明垄断问题的严重性，但其在抑制工资中的作用很难评估，且尚未得到探讨。

前路漫漫

只有制定并落实以恢复普通工人议价能力为核心的政策，才能让大多数人从未来的经济增长中受益。确保低失业率，提供适当的劳工标准，包括落实探亲假、病假和其他政策。有效执行相

关法律，通过消除强制性仲裁和竞业协议，赋予工人选择权。重建起集体谈判能力。这些政策不仅将重建公平的经济环境，还将促进公民参与民主，并促进工作场所内外的自由。

美国工人的权力被系统性地剥夺了，导致美国工资停滞不前。

几十年来，许多经济专家的传统观点认为，过去 40 年工资停滞不前不过是经济进步（如全球化和自动化）的不幸副产品，这种观点使精英阶层并无些许不安。20 年来，人们一直未能对自动化的初步理由予以说明：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持续下降，自动化的速度处于历史低位。人们本可以用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此外，这种自我安慰的论断很容易忽略了高管和收入最高的 1% 群体收入增长的情况，而此类增长并非源于他们的特殊技能或自动化。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辩论已完全超出了“自动化驱动的技能赤字”的说法，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政治和政策将决定工人能否在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公平的份额。FD

劳伦斯·米舍尔 (LAWRENCE MISHEL) 是经济政策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参考文献：

- Bivens, Josh. 2013. "Using Standard Models to Benchmark the Costs of Globalization for American Workers without a College Degree."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Briefing Paper 354, Washington, DC.
- Bivens, Josh, and Ben Zipperer. 2018. "The Importance of Locking in Full Employment for the Long Haul."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report, Washington, DC.
- Fortin, Nicole M., Thomas Lemieux, and Neil Lloyd. 2019. "Labor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Wages: The Role of Spillover Effects." Vancouver School of Economics conference pap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 Mishel, Lawrence, Josh Bivens, and Heidi Shierholz. Forthcoming. "Explaining Wage Suppression."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 Wilmers, Nathan. 2018. "Wage Stagnation and Buyer Power: How Buyer-Supplier Relations Affect U.S. Workers' Wages, 1978 to 2014."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3 (2): 213–42.

偶然而成的 经济学家

姜成贤介绍了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经济系教授丽莎·D.库克——她向我们展示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是如何伤害我们所有人的

丽莎·D. 库克首次受到种族主义歧视，是在她两岁的时候——那时她真的只有两岁。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托儿所的孩子给她起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绰号。他们打了她，导致她右眼上方留下了终身的伤疤。

“直到很久之后，我才明白那个词与暴力、种族暴力及其历史密切联系在一起，”丽莎说。从那时起，这位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关注种族问题了，她针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经历和宏观经济学的交汇点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因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而饱受抨击的经济学中，丽莎为她的性别、种族和所选的研究领域挺身而出。她的结论是，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严重拖累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发展。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我也是”(MeToo)运动的背景下，丽莎的研究发现提升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此外，丽莎还因其在发展、金融机构与市场以及经济史方面的研究而闻名。

“丽莎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在尚未受到任何人关注的领域进行研究，这些研究可能不会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但她总是愿意冒这种风险。”北卡罗莱纳州达勒姆市杜克大学经济学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小威廉·A. 达里提 (William A. Darity Jr.) 表示：“现在，人们开始认识到她贡献的重要性。”

作为位于东兰辛市的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教授，丽莎就众多主题发表了研究论文，包括：私刑对整体经济活动放缓的影响，特定黑人姓名对寿命的影响，将非裔美国人和妇女排除在创新之外造成的经济损失等。

丽莎拥有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黑人传统院校斯贝尔曼学院的学士学位、牛津大学马歇尔学者的学士学位，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谢赫·安塔·迪奥普·达喀尔大学的哲学硕士，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

今年早些时候，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被警察“跪杀”引发的抗议活动中，丽莎通过视频连线发表讲话，讨论今年的活动是否会与此前连续发生的抗议活动有所不同。

她说：“很可能会不同，各种事件同时发生，这是一种机缘巧合”。“因为疫情封锁，人们会更加关注该事件，所以我认为这次会不一样。”

佐治亚州废止种族隔离

丽莎非常了解抗议活动和如何推动变革。她的父亲（当地医院的浸信会牧师）为抗议种族隔离组织了书信活动，给她留下了深刻影响。他的一位叔叔和堂兄是小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的大学同学，并参加了他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年轻的丽莎以他们为榜样，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她说：“我每年都会在斯贝尔曼组织一次抗议活动。”活动内容包括要求学院剥离在南非的资产，反对宵禁；抗议学校食堂不提供素食和蔬菜种类选择少等。

出生在佐治亚州历史小镇米利奇维尔中产家庭的丽莎和她的两个姐妹（都是律师）都非常优秀。这座 19 世纪上半叶的州首府，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吸引了周围乡村的大量金钱和劳动力——这些乡村是这些被奴役的人们开发的。在小镇开发完之后，这些奴隶被卖至棉花种植园劳作。

丽莎在南方长大，当时南方仍在为废除种族隔离制度而做着不懈的斗争。当政府命令当地游泳池向非裔开放时，官员们并未遵守命令，反而用混凝土将其填满。丽莎回忆说，小镇上唯一接纳她和家人就餐的地方就是她父亲工作单位的食堂。

她的父亲佩顿·B·库克 (Payton B. Cook) 是佐治亚州中心医院的首位非裔牧师。他的家人说，他可能是佐治亚州被奴役人民的后裔。丽莎的母亲玛丽·默里·库克 (Mary Murray Cook) 是一名护士，是米利奇维尔佐治亚学院的第一位非裔美国教授，并受聘建立了该学院的护理系。

暴力与经济增长

丽莎的成长经历和她的种族身份，已经与所有经济学家都怀有的雄心壮志相融合，那就是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和促进增长。丽莎的大部分工作

是挖掘因不平等而产生的抑制经济增长的市场扭曲现象。

她的一篇独创性论文论证了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如何阻碍了更广泛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创新——而创新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在她的研究中，丽莎采用商业专利作为衡量经济活动的有形指标和代理变量。

借助社会史和经济史，她调查了1870—1940年动荡期间种族隔离、私刑和种族骚乱对专利申请情况的影响。1900年之前，非裔发明家的专利申请与白人发明家的专利申请趋势相同。此后，随着暴力的持续和升级，这一比率开始分化且总体放缓。非裔发明家的专利申请总数在1899年达到顶峰，而随后直到2010年才再次超过该峰值。丽莎表示“冲突可能会对经济活动产生长期且持久的影响。”

她估计，如果没有种族暴力行为，可能还会发明1100多项专利（大约是同一时期欧洲中等国家/地区所申请专利数量的总和）。

答案藏在经济学中

如果不是与一位陌生人的偶然会面，丽莎可能无法对经济学作出如此出色的贡献。在塞内加尔完成硕士课程后，丽莎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途中，碰到一位剑桥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家并与他进行了交谈。

在塞内加尔读研期间，丽莎一直被经济发展问题所困扰。“为何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她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在攀登乞力马扎罗山的五个小时中，她的同伴（她已经忘记了他的姓名）让她确信答案就藏在经济学中。

幸运的是丽莎被伯克利大学的经济学博士项目所录取。但不幸的是，在去攻读博士学位的途中，她被迎面驶来的轿车撞到，导致她双腿多处骨折，因此不得不坐着轮椅上课。尽管她父亲和姐姐一再催促，她还是拒绝回佐治亚州，而是执意继续自己的学业。

她回忆说，有些同学“有点儿瞧不起我”。“她有韧性、毅力和决心。”丽莎的姐姐帕梅拉·库克（Pamela Cook）说：“但当时她坐着轮椅去上学，同学们可能对她有了不同的看法，她用实际行动

证明他们错了。”

丽莎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了沙皇和后苏联时期俄罗斯财产权的缺失如何导致银行系统无法全面发展。她博士论文导师是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他说自己被丽莎的兴趣范围之广所震撼，从俄罗斯经济史到非洲发展再到以种族为中心的各种问题，她无所不知。

“在丽莎的论文发表之前，人们会想‘你在不同的领域之间跳来跳去，那你有多认真？’”艾肯格林说。“现在，事实证明她的确非常认真。”

在俄罗斯进行研究时，丽莎为俄罗斯缺乏创新而感到惋惜。根据当时盛行的主流经济学观念，如果政府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就会涌现出大量的创新。

但丽莎认为，这种想法忽略了创新的关键先决条件，如法治和人身安全。要验证她的理论，需要一组受暴力侵害、很少或根本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作为样本，以及一组受司法公正保护且很少担心自己人身安全人作为对照组。而20世纪初的美国发明家（黑人和白人）恰好是最理想的数据集。

因经济学而丧失信心

尽管丽莎的研究得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等著名经济学家的支持，但她职业生涯的那篇关键论文却花了近10年才得以发表。资深经济学家曾劝阻她，这会破坏她谋求终生职位的雄心。

“有人说，没有人愿意了解女性，当然也没人愿意了解非裔。”

她提交论文的诸多期刊都表示，她的发现在某个历史时期只针对某个群体，即非裔美国人；他们认为她的研究没有更广泛的意义。

丽莎的合著者俄亥俄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特雷文·洛根（Trevon Logan）说，这种缺乏远见的论断会进一步扩大。他和丽莎受到了怀疑论者的追问，对研究课题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他们被追问：“你们为什么会关注非裔美国人？这种情况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们为何要了解黑人呢？”

“这很有趣，”洛根说：“因为我们从来没有问过白人这样的问题。”

丽莎已经司空见惯了这种鄙视的态度。她还记得参观伯克利大学这座顶级学府时，教授和同学们的反应。“大多数研究生同学是男性，而且他们都劝阻我不要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她说。在为博士候选人举办的两场不同的晚宴上，她都被要求证明自己的数学能力。

唯一的例外是她得到了唐纳德·J. 哈里斯 (Donald J. Harris) 的鼓励。哈里斯是首位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的黑人学者，也是美国副总统当選人卡马拉·哈里斯 (Kamala Harris) 的父亲。

如今，哈里斯回忆说：“她对学习的渴望，想要取得成功的强烈动机以及对职业目标的长远规划，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你无法成为你不知道的样子”

2019年，丽莎当选美国经济学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她承认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缺陷。

去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中，丽莎写道：“如果说经济学对女性怀有敌意，那么它对非裔女性的敌意尤其强烈。”她引用了该协会对9000多名会员进行的内部调查，其中62%的非裔女性经济学家表示，她们曾遭受过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或两者兼之。

在该调查中，只有3%的人认为自己是黑人，而黑人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为13%；4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在经济学中受到歧视；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无论种族如何）表示，他们认为非白人经济学家受到了应有的尊重。

她说：“我们要保持竞争力和活力，以及创造知识的唯一方法是尽可能接纳更多的不同想法，并加以利用，否则我们将无法发展。”

丽莎热衷于打造一支多元化的未来经济学家队伍。她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暑期项目的主任，负责为代表性不足的群体招募成员，并经常担任他们的导师。其中一名新成员是24岁的加纳裔美国人安娜·吉菲·奥波库-阿吉曼 (Anna Gifty Opoku-Agyeman)，她与丽莎为《纽约时报》专栏合著文章，她说自己以丽莎为榜样并受到了鼓舞。

“我认为，作为非裔女性，她就是一切，”她说：“如果她是白人，我可能会说‘噢，就那样吧’。你无法成为你不知道的样子”她引用了美国童权利活动家玛丽安·赖特·埃德elman (Marian Wright

Edelman) 的话。

最大限度地扩大机会

丽莎最惊人的一项研究结果是：将非裔美国人和非裔女性排除在技术创新的行业之外，每年给美国经济带来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她估计，这使美国每年人均GDP损失4.4%，而只排除非裔女性的损失为2.7%。

对丽莎的崇拜者来说，她的作品不仅具有独创性和冒险精神，而且对正在经历种族暴力和不公的美国也有很多启发。

但她的研究结果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凭借其身份就享有优势的人们会自愿放弃这些特权？丽莎的答案是：因为这最终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她拒绝接受所谓的“最佳思想”（无论其源自何处），也拒绝剥夺提供给相当一部分人的会导致特权阶层损失的机会。

丽莎用2016年好莱坞电影《隐藏人物》中的一个场景说明了她的观点。该电影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美苏太空竞赛期间，三位非裔女性数学家在严重的种族偏见中依靠学识和美好的品德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拥有一席之地的历程。

其中有一个场景，宇航员约翰·格伦 (John Glenn) 要求“让女孩核对数字”。他说的女孩就是非裔美国人凯瑟琳·约翰逊 (Katherine Johnson)，她是NASA航天研究部的“人体计算机”。格伦意识到凯瑟琳的独特技能，他指名要凯瑟琳再次核验太空舱轨迹后才升空，可以说他将自己的生命押在凯瑟琳手中。

丽莎回忆这一场景，说：“这是约翰·格伦说的，‘我信任你，你是唯一知道怎么做的人。’他依靠一名黑人女性（而不是她的白人男性同事）将他送上月球。”

丽莎的研究结论是我们要大力呼吁的，不仅要整合思维的多样性，也要整合生活经验的多样性——不仅要将这些多样性融入经济学，还要融入各个领域。她表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将付出代价。FD

姜成贤 (Hyun-Sung Khang)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



坚决打击腐败

欧盟首位反欺诈检察官反思应对跨国犯罪的挑战

劳拉·科德鲁塔·科维西 (LAURA CODRUTA KÖVESI) 对反腐界而言并不陌生。她曾是罗马尼亚最年轻的首位女性总检察长，随后于 2013 年至 2018 年期间担任罗马尼亚国家反贪局局长。她锲而不舍和无所畏惧的精神为她的职业生涯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目前，科维西被任命为欧盟首位反欺诈检察官，负责管理新设在卢森堡的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 (EPPO)。该办公室主要负责调查、起诉和判决违反欧盟预算的犯罪行为，如欺诈、腐败、有组织犯罪和金额超过 1000 万欧元的跨境增值税欺诈案件。

此前，只有欧盟成员国的国家检察官才有权处理本国（无权干涉其他欧盟国家）的此类犯罪

行为。就此类犯罪行为，欧洲刑警组织和欧盟反欺诈办公室等其他机构不享有采取行动的合法权力。欧盟委员会报告称，2018 年欧盟国家因欺诈和逃税导致增值税收入损失了 1400 亿欧元，而因新冠疫情的影响，预计 2020 年该损失将高达 1640 亿欧元。

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能成功打击该跨国犯罪行为吗？就此问题，本刊编辑拉希姆·卡纳尼 (Rahim Kanani) 采访了科维西女士。

《金融与发展》：您在罗马尼亚的经历为该新职位带来的最重要的经验是什么？

劳拉·科维西：在罗马尼亚国家反贪局的工作经历证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我们不仅提高了人们对腐败严重性及其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的认识，也向人们展示了罗马尼亚的机构能够有效合法地打击腐败，腐败并非无法解决的问题。

《金融与发展》：建立高效的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什么？

劳拉·科维西：首先，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是从零开始设立的新机构，因此要确保行政、预算和立法规则妥善就位，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此前没有此类机构的经验可供参考，因为我们必须要协调 22 个欧盟成员国的检察官的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司法机构工作，实施不同的程序规则，我们必须找到共同点。

一旦投入运营，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将面临第二个挑战，即确保其高效独立运营并赢得民众的信任——我们只有通过有效推进相关工作并证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赢得信任。

《金融与发展》：您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完成任务？

劳拉·科维西：经过反复讨论，且考虑到工作伊始我们预计将要处理 3000 个案件，

我们的预算编制已包括 140 名欧洲授权检察官，但是卢森堡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人员仍缺乏必

要的资源，这些工作人员是我们任务成功的关键。我们需要财务调查员和案件分析员，凭借他们的专业知识，我们可以收集和分析信息，以更有效地调查跨境犯罪。到目前为止，各国检察官只能处理所在成员国境内的犯罪行为，他们不一定总能够获得银行账户和具体的金融交易等境外信息。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使其成为可能。

调查本身还不够，另一项重点工作是追回损失的钱款或弥补损失。通过总部的专职人员，我们可以确定可被扣押和查封的货物和银行账户，这将在调查财务欺诈方面带来更有效和更高效。

具体来说，我一直在争取 5500 万欧元的预算，目前我们只拥有 3770 万欧元。与需要调查的诈骗金额（数十亿美元）相比，这并不是一笔大数目。

《金融与发展》： 欧盟公共检察官办公室如何决定需要深入调查的案件？

劳拉·科维西： 我们的主要指导原则是合法性，而不是机会原则。在确定优先顺序方面，标准可以包括损害赔偿的金额或诉讼时效。此外，我们还必须考虑嫌疑人的职务。如果有人涉嫌职务犯罪，则我们可能需首先关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工作需与各个国家的公安、税务及其他国内机构合作，所以我们需要各个国家主管部门的协助。

《金融与发展》： 调查性报道对打击腐败有多重要？

劳拉·科维西： 调查性记者是非常可靠的信息来源。我们有时候根据记者提供的揭露潜在犯罪行为的信息开展调查，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更多文件、录音和其他被证实有用的材料。我把记者视为合作伙伴，因为他们是我们案件的报道者，他们可以帮助我向公众宣传我们的工作，告知公众腐败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以及腐败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在 90% 的案件中，记者和检察官都有相同的目标，但也略有差异：记者渴望更多地了解我们的调查情况，而我们不能透露太多。不过，最重要的是找到共同点。

几年前，罗马尼亚爆发了一场针对法治的大规模游行，原因是有人提出立法建议，要求削减检察官开展调查所需的工具和资源，还将明显的犯罪和腐败行为合法化。还有人提议取消对检察官独立性的法律保障，由司法部长领导并管辖检察官；将职务犯罪合法化标准定为 20 万列伊（约 47800 美元）；赦免逃税；通过中间人进行的行贿应合法化；禁止将在公共场所获取的录音用作证据；如果一年内未结案则结束调查等等。

记者们对为何反对该等提议如此重要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报道，同时 50 多万人走上街头抗议该等提议以支持法治。

记者们还会打电话给我们，告知他们掌握了潜在违法行为的相关信息，但他们想首先确认下发表相关报道是否会妨碍调查，如果会，他们就会推迟报道。

《金融与发展》： 您刚才提到赢得民众信任是高效反腐的支柱。您打算如何赢得民众信任？

劳拉·科维西： 当你根据确凿的证据展开调查，以独立有效的方式在法庭上定罪时，你就可以赢得民众信任。但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即使我们在开始工作的第一天就启动 3000 或 5000 个案子，也无法赢得民众信任。你需要获得可信的结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法庭上作出明确的判决。这需要时间，需要两三年，而不是两三天。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构建一个强大而独立的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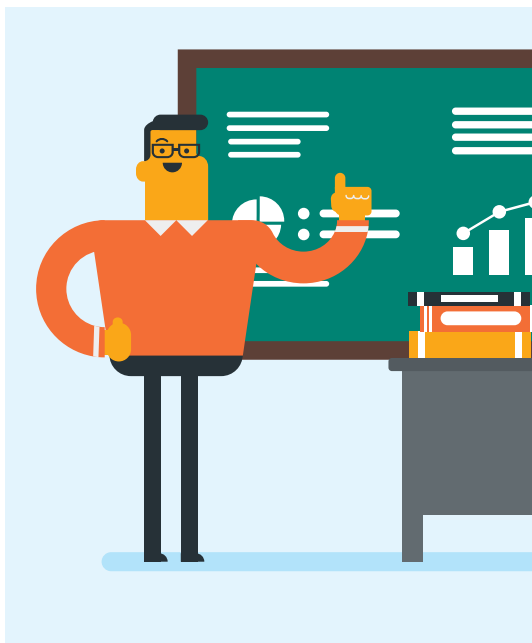
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向我们投诉并提供线索。在罗马尼亚，我们的大多数案件都是从民众提供的信息中找到突破口的。民众的投诉案件数量在一年之内就激增了 60% 以上，这是非常好的迹象，表明你赢得了民众信任，如果他们信任你，他们就会对你有信心，为你而战。我们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这就是正义。

本采访内容因篇幅和清晰度有所删改。FD

何谓非正规经济？

减少正规经济之外的劳动者，有助于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科琳·德莱沙和莱昂德罗·梅迪纳



非正式经济是一种全球现象，其包括了具有市场价值的经济活动，且一旦被记录，将可能增加税收收入和 GDP。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表明，约 20 亿工人（即全球 15 岁以上就业人口的 60%）至少将一部分时间用于非正规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非正规经济部门的规模逐渐减小，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却存在巨大差异。时至今日，中低收入国家的非正规经济部门仍占其总体经济活动的 1/3，而在发达经济体中其占比仅为 15%（见图）。

非正规经济部门涉及一国之内和国家之间的很多情况，非正规经济产生的原因有很多。

一方面，个人和企业可能会倾向于游离于正规经济之外，以减轻自身税收负担和社会义务，或尽量少受到标准和许可要求的束缚——而人们普遍误解非正规经济主要是由企业和个人通过“欺骗”进行逃税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有些个人可能需要依赖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此类人群可能不具备在正规经济中就业的教育背景和技能，或者因太穷而无法获得公共和金融服

务。基金组织即将出版的一本书汇总了其工作人员和学术研究人员

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将从全新的视角更详细地衡量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分析其成因和经济影响，讨论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人们日益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现象的高发和持续存在（特别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阻碍了其可持续发展。处于非正规经济部门的企业不会扩大税基，而且规模较小，生产率低，融资渠道有限。因此，非正规经济占比高的国家或地区通常经济增长乏力。相比正式员工，非正式员工的收入较低，这是因为他们未签订正式合同、缺乏社会保障，也因为其受教育程度往往较低。

此外，非正规就业现象的普遍存在还与高度不平等有关：相比正规就业人员，具有类似技能的非正规就业人员往往收入较低，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尤其对于需要较低技能的工作而言）。在过去 20 年中，拉丁美洲的非正规就业大幅下降，这与不平等现象的大幅减少有关。

非正规就业也与性别不平等有关。在 2/3 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中，女性在非正规就业中的占比更高，而且她们往往从事一些极不稳定以及收入最低的工作（见图 1）。

因此，为促进包容性经济发展和减少全球贫困，我们亟须解决非正规经济的问题，这至关重要。新冠疫情的暴发和蔓延增强了这种紧迫感。疫情给全球范围内的非正规经济活动带来了沉重打击，令各国社会保障计划范围之外（或保障程度不高）的很多底层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因而为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是当务之急。

然而，由于一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各种非正规经济因素和形式十分复杂，要为解决非正规经济的问题制定有效的政策并非易事。应根据一国的具体国情和制度解决非正规经济问题，因为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尽管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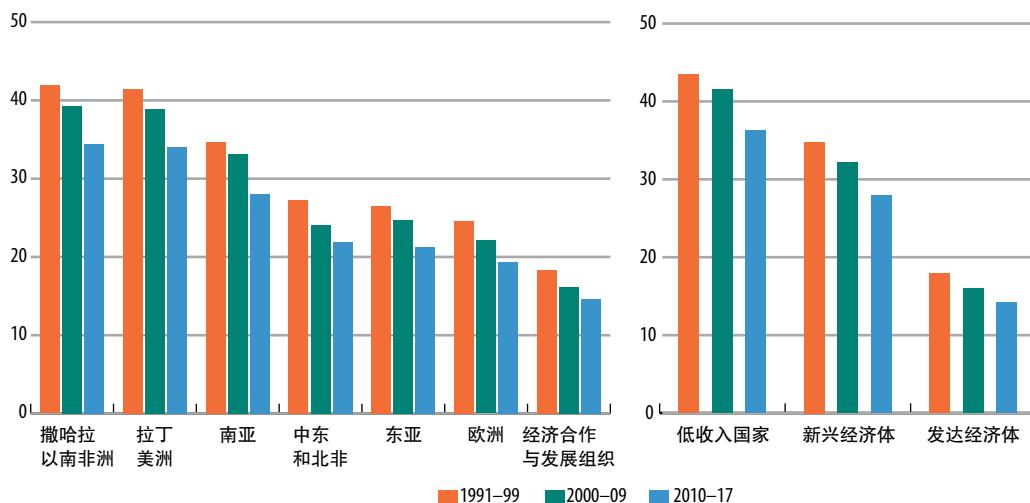
图1

隐藏的1/3

尽管非正式经济在萎缩，但仍占中低收入国家经济活动的1/3。

(按区域划分的非正式经济规模，占GDP的百分比)

(按收入水平划分的非正式经济规模，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莱昂德罗·梅迪纳和F.施耐德 (F. Schneider)。即将发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

注：OECD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中的广泛研究和政策实验都指出了一套共同的政策设计指导原则。事实证明，以下四类政策是有效的：

- 增加教育机会和提高教育质量可能是减少非正规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教育改革旨在提升教育平等，确保学生可完成中学阶段的学业（提供充足的技术和职业培训机会），这至关重要。

- 税收制度应避免无意中造成个人和企业对非正规经济的偏爱。人们普遍认为，增值税和企业税制越简单（没有或只有很少的豁免项和漏洞）、税率越低，以及更低的工资税，有助于减少非正规经济部门。支持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累进所得税制和针对最贫困人口保障措施，有助于解决分配问题。

- 让更多人能获得正式（或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并以此推动普惠金融的政策，可以帮助减少非正

- 规经济部门。缺乏融资渠道是限制非正规经济中企业和企业家发展的主要因素，这阻碍了它们生产率的提升和业务的增长。相对而言，在融资服务更加普及的国家，经济增长更快，其收入不平等程度也较低。

- 一系列结构性政策有助于进一步鼓励正规

经济部门发展并降低其成本。我们可以简化劳动力市场的监管，以确保更大的灵活性并促进非正规员工实现正规就业。合理的竞争政策有助于打破垄断，促进小企业进入某些领域。同时，抛弃过多的法规和官僚主义要求，也能有所帮助。另外，政府到个人的移动支付等数字化服务也可促进包容性增长，具体措施包括向没有银行账户的人提供金融账户，赋予女性经济权能，并帮助中小企业在正规经济领域发展壮大。

非正规经济部门严重影响着一国发展经济并为其人民提供体面经济活动机会的速度。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逐步减少非正规经济部门，但这无法一蹴而就，因为目前数十亿人仍依赖非正规经济活动谋生。持续推进改革（例如投资教育和解决根本问题的政策）是解决非正规问题的最佳方式。然而，若认为非正规经济普遍都是非法经营和逃税行为，并以此对其进行打击，这并非解决之道。FD

科琳·德莱沙 (Corinne Deléchat)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非洲部的处长，而莱昂德罗·梅迪纳 (Leandro Medina)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战略、政策与检查部的高级经济学家。

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疫情让年轻人苦不堪言。

假如你现在 22 岁，风华正茂。你可能刚大学毕业正式踏入社会，或在学校、工作和家庭间奔波。又或许你刚失业或怀才不遇，正在努力维持生计，而疫情在全球蔓延使你每天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为进一步了解年轻人对这一史无前例的疫情的态度和应对措施，国际劳工组织 (ILO) 和“为青年创造体面工作机会全球倡议” (Global Initiative on Decent Jobs for Youth) 的合作伙伴于今年早些时候对来自 112 个国家的 12,000 多名 18 至 29 岁的年轻人进行了调查。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疫情给年轻人带来了“系统、深重和不成比例的”的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年轻女性和青年尤其如此。教育受到严重干扰，1/8 的年轻人无法正常学习、接受教育或培训。

新冠疫情让年轻劳动者倍感不安。1/6 的受访者在疫情暴发后失去了工作，其中 18 至 24 岁

的年轻人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有些年轻人即使仍有工作，但工作时间大幅缩短，2/5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锐减。

疫情带来了巨变，影响了年轻人的健康，包括心理健康。许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出现了焦虑和沮丧等不良情绪。尽管如此，报告发现仍有很多年轻人化危机为转机，他们通过成为志愿者和提供捐助等方式支持所在社区的发展。

该报告还呼吁增加“紧急、有针对性和更明智的”应对措施，以帮助年轻人“体面就业”。报告还强调需要保护人权，改善就业和培训计划（包括在线学习计划），完善社会保障和失业救济机制，以及加强心理健康支援。^[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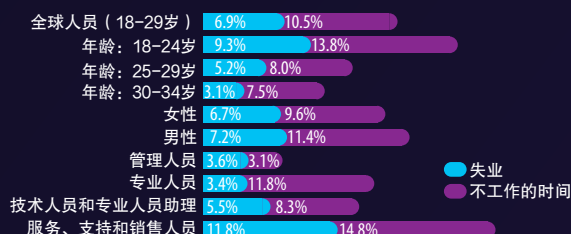
梅琳达·威尔 (MELINDA WEIR) 是《金融与发展》的工作人员。本专题文章以国际劳工组织 2020 年 8 月发布的《青年与 2019 冠状病毒疾病：对就业、教育、权利和心理健康的影响》报告为基础编写。

ICONS: THE NOUN PROJECT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就业危机随之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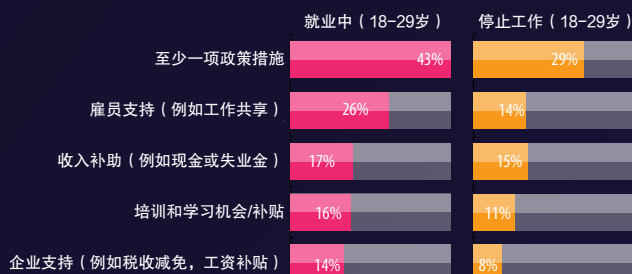
停止招聘

疫情暴发后，有 1/6 的 18-29 岁之间的年轻人失业或陷入完全无法工作的状态。其中，服务业、支持业务和销售人员受到的冲击最大。



政府 (对部分群体的) 支持

在全球范围内，疫情暴发后坚守工作岗位的年轻人比失业的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政府援助，前者更多受益于政府采取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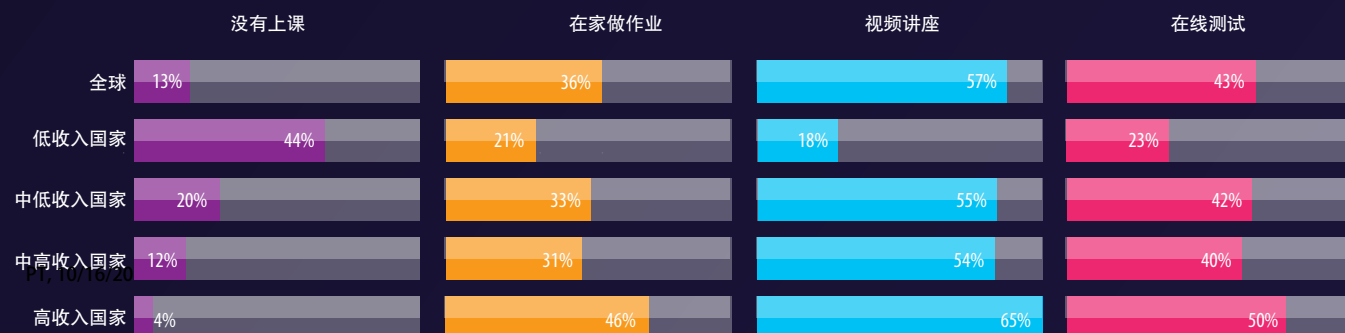


学校停课

教育和培训规模萎缩

使用Zoom开展在线教学（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

2020年春季，将近1/8年轻人的教育和培训因疫情而完全停止。来自低收入国家44%的受访者表示根本无法上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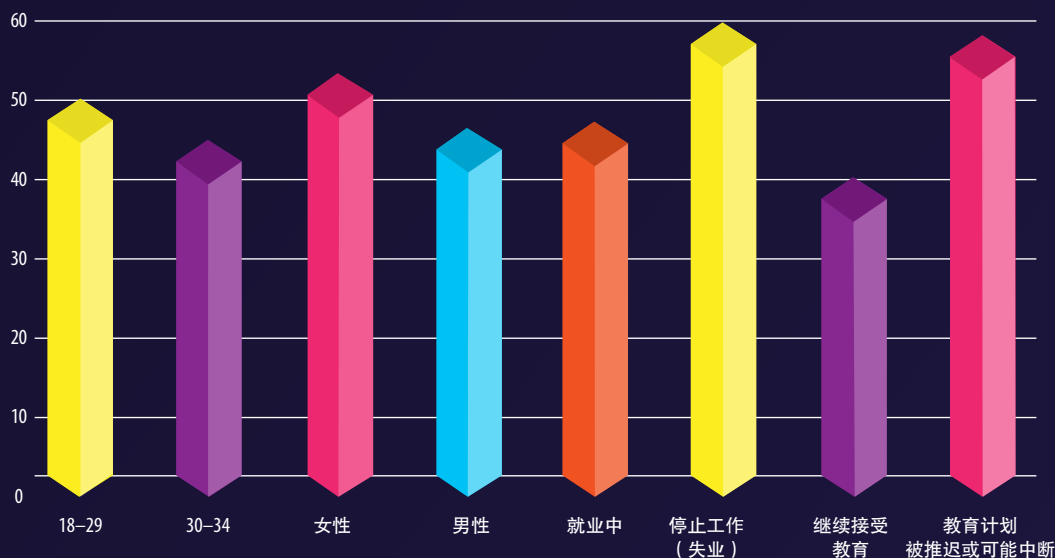


疫情影响人们的心理健康

心理问题的“疫情”

约一半的年轻受访者表示出现焦虑或抑郁情绪，而年轻女性以及失业人员或教育被迫中断者的心理

（以%表示）



50%
以上

的18-29岁年轻人
出现焦虑或抑郁迹象。

注：根据沃里克-爱丁堡积极心理健康量表判定的可能出现焦虑或抑郁迹象的受访者比例。

资料来源：《2020年疫情期间青年体面就业全球调查报告》。

非洲森林象（学名：Loxodonta cyclotis）
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的森林地带。

非洲森林象的秘密

非洲森林象以独特方式应对气候变化

拉尔夫·恰米，康内尔·弗伦坎普，托马斯·库西马诺和法比奥·贝扎吉



非洲森林象陷入了困境。约有 110 万头大象曾经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中非雨林中，但滥伐森林和偷猎活动导致其数量锐减，目前已不足以前的 1/10（见图 1）。人类必须采取挽救行动，否则它们很可能会灭绝。

然而，中非以外的大多数人都不知道非洲森林象的存在。在人们心中，非洲象是另一个物种，它们生活在热带稀树草原上。除了当地保护主义者和从事动物研究的生物学家以外，很少有人关注非洲森林象。

然而，如果了解非洲森林象的可贵之处，情况可能会有很大改观。尽管由于地理和政治原因中非雨林还处于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几乎没有生态旅游，但不可否认的是，非洲森林象创造了巨大的社会和市场价值。事实

证明，非洲森林象可通过自然碳捕获来应对气候变化。

大象扮演环境工程师角色

生物学家最近记录了大象扮演环境工程师的过程，该过程非同寻常。

非洲森林象在雨林中穿梭觅食，它们会踩倒或吃掉一些树木，从而让争夺空间、水和光的幼树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大象体型庞大，食量超大，所到之处，披荆斩棘，大大降低了植被密度。与森林中的其他树木相比，大象攻城掠地后留下的树木享有巨大的成长优势，它们会获得更多的空间、水和阳光，因而可以长得更高更大。换句话说，它们走



森林象活动带来巨大的碳储存，价值不菲。

到哪里，哪里就会有更大、更高的树木出现。

相比原本自然生长的树木，这些树木（生物学家称之为“晚期演替树木”）可在其生物质中存储更多的碳。所有树木都可在其组织中捕获碳（平均每年约 50 磅）。相比那些原本可以自然生长并占据主导的其他树木而言，晚期演替树木更高更大，可从生物质中捕获更多的碳。因此，森林象通过打破生物平衡（偏爱某类树木）增加了雨林的碳存储量。简而言之，大象扮演着环境工程师的角色（见图 2）。

非洲森林象活动带来巨大的碳储存，价值不菲。生物学家估算，如果非洲森林象数量恢复到从前的规模，并且收复了原来的“势力”范围，

则每公顷（10000 平方米）的碳捕获量将增加 13 公吨（1 公吨 = 1000 千克）。以前，非洲森林象的活动范围为 220 万平方公里（1 平方公里 = 100 公顷），而目前森林象数量约为偷猎前的 9%。如果非洲森林象可以恢复到此前的数量和规模，则其在每平方公里范围内可捕获碳 6000 公吨以上的二氧化碳，相当于 25 万棵树捕获的二氧化碳量，或纽约中央公园中树木碳捕获量的 14 倍。

按照一公吨二氧化碳的平均市场价格（2019 年，将近 25 美元）计算，恢复数量后的非洲森林象在 220 万平方公里雨林中捕获的二氧化碳量将创造 1500 多亿美元的价值。

如果将非洲森林象创造的上述价值除以其当前数量，则得出每头大象创造的价值高达 175 万美元（见图 3）。然而，一头被偷猎者杀害的大象的象牙仅能卖到 40000 美元。因此，健康而生生不息的大象群体给我们带来的收益更加巨大。

不幸的是，非洲森林象目前正在与残酷的生存环境作斗争，偷猎和森林滥伐致使它们濒临灭绝。

资源估值激发行行动潜能

我们已开发了自然资源估值框架（Chami 等人，2020），可直接解决环保中的基本集体行动问题。

每天，某些固定的估值会激励数百万人将他们的积蓄投资于有风险的长期资产和项目，而其他估值无法做到这样。那些促成最终投资的估值，都是建立在可信的故事上的——这些故事需要能详细介绍资产或项目如何能为其所有者创造

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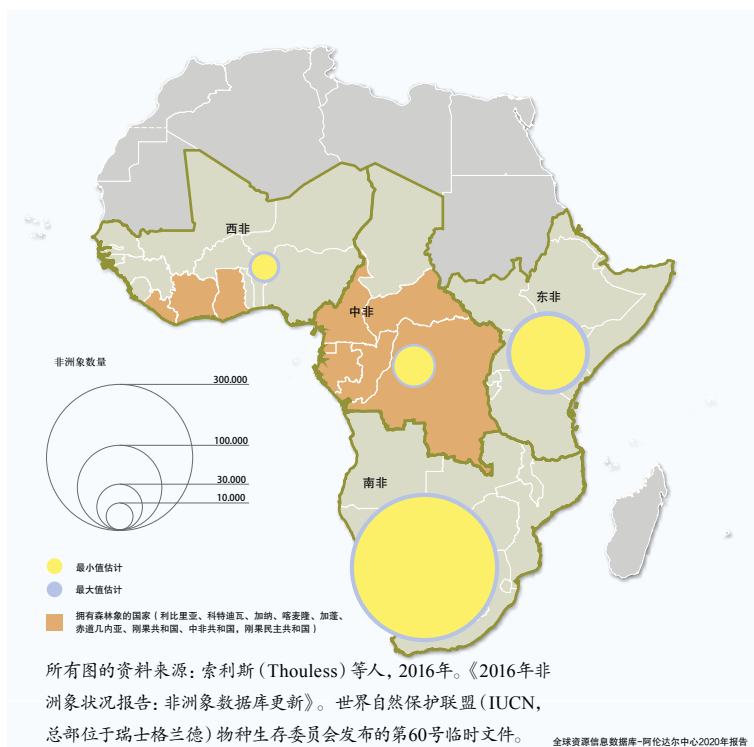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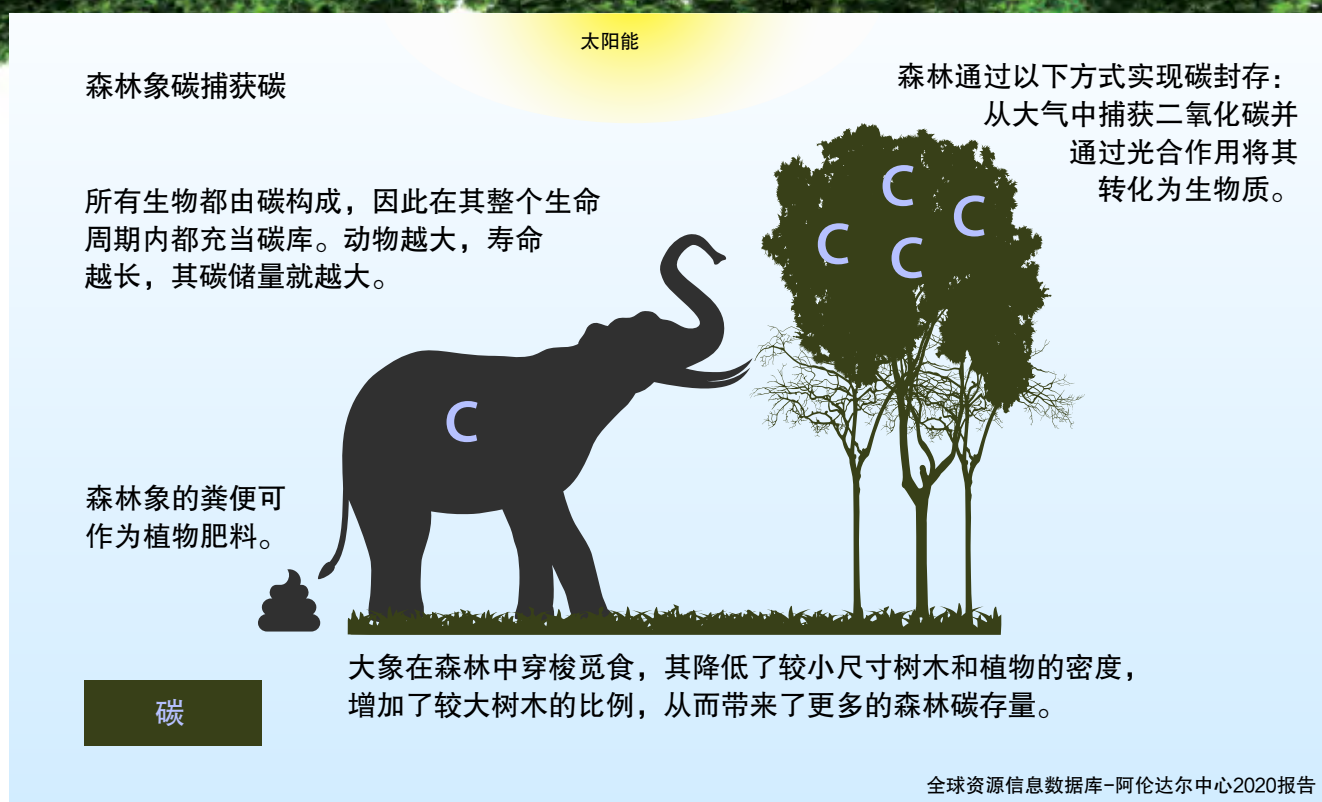


图2



收入。而这反过来又有助于准确预测未来的收益。如果预期收益的当前货币价值超过资产或项目的成本，那么投资者就会趋之若鹜。

这种成本收益分析法还可用于保护和投资生态系统，并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如果能够准确地识别和计算自然资源（例如休闲、旅游和碳封存）的市场价值，则可以将收益的当前货币价值与投资成本进行比较（类似其他资产处理方式）。

由此产生的估值可有效地激励环境投资。原因在于：首先，其清楚地说明了存量自然资源带给人们的收益（以非洲森林象为例），帮助人们了解这些资源与其生活的相关性。此外，以货币形式说明自然资源带给人们的益处，以进行成本收益比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人们更喜欢基于直观的财务数据进行分析、判断和决策。最后，凸显这些自然资产可能创造的巨大价值，从而证明保护此类自然资产的合理性，同时也会给潜在投资者带来惊喜，刺激他们的投资欲。行为经济学研究表明，人们在产生共鸣后更愿意购买产品或进行投资。

共赢的机会

总体来说，保护大象等自然资源和维护健康的生态系统，并在法律框架下明确资源管理者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实现利益相关方（政府、私人部门，本地社区和全球合作伙伴）之间的共赢。一旦适当的法律框架搭建成功，就可合理索取并分配自然资源带来的经济收益。在非政府组织和全球机构的支持下，这些收益可用于促进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并为当地社区带来直接红利，使他们成为这一变革的主人翁。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可持续发展筹资倡议是一项关于自然资源的典型倡议，其中涵盖“债务与自然置换”的内容。根据合约规定，贷方同意减少借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条件是借方必须保护特定的自然资源。许多拥有森林象的国家负债累累，但其可受益于债务自然交换。一国的债务减免额取决于其大象服务的价值（根据市场价格计算），而债务减免的金额应将专门用于大象保护。应通过投资和保护大象来促进公私部

图3



门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培育市场（包括旅游和保险市场）。这些市场将为当地社区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从而使当地人成为这些活动的主人翁，同时以可持续的方式开展生态保护工作。

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金融机构可为公私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和以自然资源为中心的保险市场提供必要的能力建设支持。“债务与自然置换”的例子表明，重视自然保护有助于良性循环发展，刺激投资并引导企业实现可再生、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始于水产市场的一种病毒，疫情蔓延之快出人意料，说明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可迅速对全球造成影响。全世界都发出了警报，需要我们努力回归正轨。人类对自然世界的破坏不仅导致经济体系的剧烈波动，而且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充满活力的完整生态系统，包括健康的森林象、大鲸鱼、红树林和海草等，都生动地说明了自然保护投资的重要性，其将进一步促进蓝色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变

化，并使各经济体实现包容性和自然友好型经济增长。FD

拉尔夫·恰米 (Ralph Chami)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能力开发研究所的助理主任；康内尔·弗伦坎普 (Connel Fullenkamp) 是杜克大学经济学系经济学实践教授和本科研究院主任。托马斯·库西马诺 (Thomas Cosimano) 是圣母大学门多萨商学院的名誉教授；法比奥·贝扎吉 (Fabio Berzaghi) 是位于法国吉夫伊维特 (Gif-sur-Yvette) 的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员。

参考文献：

- Berzaghi, F., M. Longo, M. Ciaia, and others. 2019. "Carbon Stocks in Central African Forests Enhanced by Elephant Disturbance." *Nature Geoscience* 12:725–29.
- Chami, R., T. Cosimano, C. Fullenkamp, and S. Oztozun. 2019. "Nature's Solution to Climate Change."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56 (4): 34–38.
- Chami, R., C. Fullenkamp, F. Berzaghi, S. Español-Jiménez, M. Marcondes, and J. Palazzo. 2020. "On Valuing Nature-Based Solutions to Climate Change: A Framework with Application to Elephants and Whales." *Economic Research Initiatives at Duke Working Paper* 297, Duke University, Durham, NC.

算上女性

——让她们发挥重要作用

“性别方面的数据差异不仅仅源于人们长久以来对女性的漠视。这些漠视和差异还产生了重要得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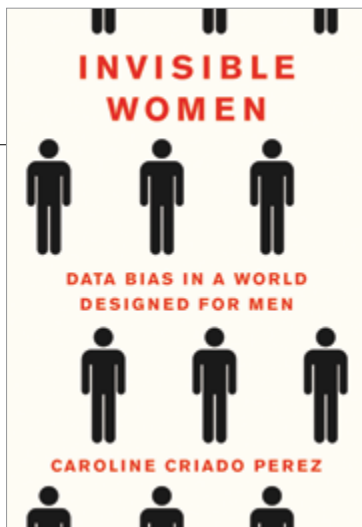
这是卡罗琳·克里亚多·佩雷斯 (Caroline Criado Perez) 在她的《被忽视的女性》一书中表达的观点。

卡罗琳强调说，在生活中处处存在“默认为男性，除非另有说明”的惯例和“男性普适性”的传统，这并不是恶意、甚至也不是故意的，而是数千年固化下来的思维模式。

卡罗琳在书中列举了许多对女性有偏见的例子——其中的一些十分著名，另一些则鲜有人知。其中包括众所周知的向男性网球选手安迪·穆雷 (Andy Murray) 的致敬事件 (2013 年)。他被誉为首位赢得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的英国人，而事实上，女性选手弗吉尼亚·韦德 (Virginia Wade) 早 1977 年就已经获得了该项赛事的冠军。

卡罗琳坦言，缩小性别方面的数据差异并不能像变魔术一样解决所有问题。

本书最令人信服的部分讨论了未按性别提供分类数据所导致的后果。她介绍了瑞典卡尔斯库加镇的除雪时间表：首先对主干道进行除雪，最后清理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其实，这里面也体现了性别歧视。为什么？因为男性一般需要驾车或乘坐公共汽车去上班，而女性则基本带着孩子步行去上学，有时还可能推着婴儿车。除雪时间表看似合理，但女性往往肩负着“不合理”的照看家庭的负担，使她们陷入双重困境。歧视案例比比皆是，有的甚至隐藏的很深。许多歧视现象损



卡罗琳

被忽视的女性：
专为男人设计的世界中的数据偏见

艾布拉姆斯图书出版社 (Abrams Books)

纽约，

2019 年，432 页，价格：27.00 美元

害了女性健康，例如针对女性公共卫生间的设施不足，或针对女性心脏病的医学研究不足，这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此外，卡罗琳还列举了一些对女性有偏见的（颇具启发性的）日常生活案例。虽然有些常用产品男女通用，但其基本都是按照“男性标准”设计的。她举例说明了汽车安全设备（座椅头枕、安全带和安全气囊）的设计。碰撞试验用的假人在设计上使用了处于中位数的男性特征，即约 1.77 米高和 76 公斤重。事实上，安全设备设计几乎未考虑到女性平均身材相对矮小这一事实，导致女性在事故中更容易受伤（比男性高 47%）和死亡（比男性高 17%）。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们在设计汽车安全设备时未考虑性别差异。

卡罗琳在书中还分析了经济学家更为熟悉的领域，包括忽视了女性在做家务和照看家庭方面的默默付出（无薪），税收对女性选择外出工作的影响，以及女性在世界贫困人口中的高比例问题。

卡罗琳坦言，缩小性别方面的数据差异并不能像变魔术一样解决所有问题。她认为，只有让女性在领导岗位和政府机构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才能彻底缩小性别方面的数据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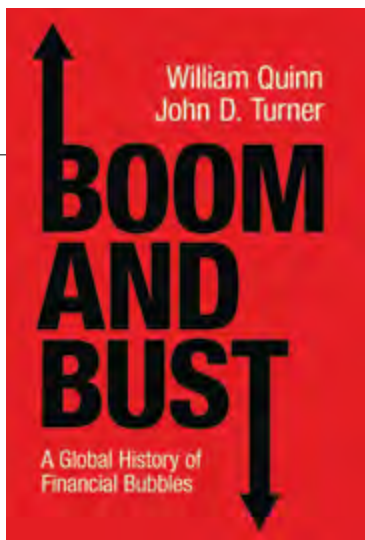
对于任何想真心解决全球一半人口所面临问题的研究者和决策者来说，本书实属必读。FD

卡尔帕·纳科赫哈 (Kalpana Kochhar)，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人力资源部主任。

泡沫

从 18 世纪初的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和南海泡沫事件,到 21 世纪的次贷危机和中国的产能过剩,《繁荣与萧条:全球金融泡沫史》以独特有趣的方式为读者们介绍了投机性金融危机的历史。在查尔斯·P. 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 著有《狂热、恐慌与崩溃:金融危机历史》一书)和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 著有《金融市场狂热简史》一书)的重要分析基础上,作者威廉·奎恩(William Quinn)和约翰·特纳(John Turner)提出了新颖的“泡沫三角”概念,以更好地评估和了解繁荣与萧条。

威廉·奎恩和
约翰·D.特纳
繁荣与萧条:
全球金融泡沫史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 2020 年,
296 页, 价格: 24.95 美元



他们将金融泡沫视作由氧气、燃料和热量形成的火。

泡沫三角的第一个要素是资产的适销性(即资产是否便于买卖),其相当于氧气。第二个要素是货币和信贷(即利率水平和财务杠杆),其相当于燃料。第三个要素是投机行为(指资产购买行为主要由资产价格持续上涨的预期驱动),这相当

于热量。

奎恩和特纳指出,在过去 300 年中泡沫之“火”的触发因素有两个:技术创新和政府政策。

这对投资者和决策者有什么意义?从预测金融危机的角度来看,泡沫三角的三个侧面是泡沫形成和持续的必要条件。这个框架也可用于评估萧条的严重程度。例如,杠杆一直以来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另外,泡沫三角还可用于解释泡沫频率的增加。资本市场的全球化、去监管和技术变革造成了债务激增。将来,这是否会造成更频繁、更严重的繁荣与萧条?

要实时、无误地确认泡沫十分困难,而戳破泡沫可能弊大于利。

我希望作者们能开展更多政策辩论,为决策者们提出应对恶性泡沫的具体措施。例如,应首先解决泡沫三角中哪一侧的问题?作者们认为,决策者可以减少货币和信贷,从火中撤出一些燃料。但是他们似乎认为,收紧货币政策或逆向操作的实施面临着巨大挑战。要实时、无误地确认泡沫十分困难,而戳破泡沫可能弊大于利。

然而,宏观审慎政策可以作为货币政策的有益补充,帮助决策者实现传统的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目标——即使宏观审慎框架仍在不断演化(特别是对于非银行金融机构而言),或是可用工具包仍然有限时,也是如此。

最后,作者似乎认为:决策者最多可以做到收拾残局;而投资者则需要扮演“消防安全检查员”的角色——此外,他们也应引以为鉴,充分认识到泡沫三角中蕴含的危险。**FD**

法比奥·纳塔鲁奇(FABIO NATALUCCI),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

追求稳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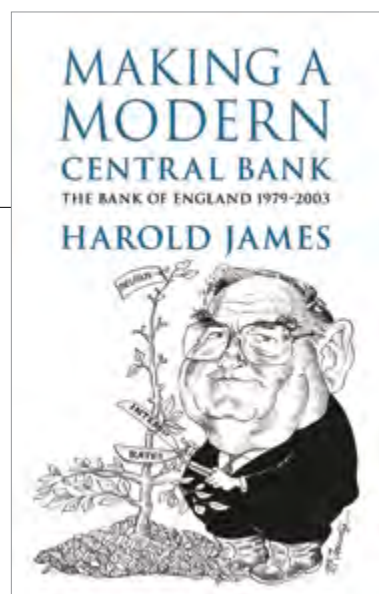
1997年，英格兰银行再次获得独立地位，结束了其在20世纪的曲折发展史：20世纪30年代之前，英格兰银行曾拥有巨大权力；随后的数十年里，其沦为英国财政部的运营分支机构；70年代末和80年代，英格兰银行重获权力；最终，该行最终完全摆脱了日常的政治干预。然而，这一切并非理所当然。本书讲述了在1979年至2003年间，当政客和官员用尽了各种货币花招后，一个杰出的团队是如何建立起这个独立的机构的。本书的标题和封面恰如其分的传达了这一观点。埃迪·乔治(Eddie George)也许是继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之后最优秀的央行行长，代表了从旧到新的转变。

本书是哈罗德·詹姆斯(Harold James)的新作，内容丰富、见解深刻，涉及三个领域：经济和政策史、制度史和组织史。本书在写作上主要遵循了标准模式，即介绍了各个政策事件和组织之间的故事，但这些故事背后有一个主题：即内部变革和辩论是如何为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如果您对20世纪80年代英国财政部主导的迂回曲折且极其痛苦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及90年代英国财政部的逐步修正感兴趣，那么本书是一本必不可少的读物。同样，在一系列各不相同的银行破产事件后(约翰逊马修银行、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巴林银行等)，原本以判断为基础、曾一度成功维护金融稳定的金融监管体系，被独立于央行的监管制度所取代(这一制度最后遭遇了系统性崩溃)——如果你对这段历史也感兴趣，那这本书也属必读。

本书流畅展示了政策动议、挫折和改革。但是，对于推动改革的个人层面的竞争和观点，我们从书了解到的不多。

历史上，戈登·理查森(Gordon Richardson)重新树立了央行行长的权威；罗宾·利·彭伯顿(Robin Leigh-Pemberton)培养了一支世界一流的团队(包括国际清算银行后来的行长安德鲁·克罗克特(Andrew Crockett))；乔治·布鲁登(George Blunden)大刀阔斧清除改革障碍；埃迪·乔治(Eddie George)和默文·金(Mervyn King)功绩累累，怎么称赞其在英格兰银行战略转型中的作



哈罗德·詹姆斯

打造现代化的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979—2003

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2020年，350页，价格：110美元

用都不为过。遗憾的是，本书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相关细节。

回想起来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英国政府曾坚决反对埃迪·乔治出任英格兰银行副行长，最后尽管同意了，但条件是他日后不能出任行长一职(我当时担任行长的私人秘书，是我帮助传达了 this 意见)。此外，英国国内也在是否让英格兰银行承担金融稳定职能这一问题上爆发了长达15年的斗争，一度“接近内战的边缘”。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后，这一问题才有了定论。在这方面，本书也没有给读者太多信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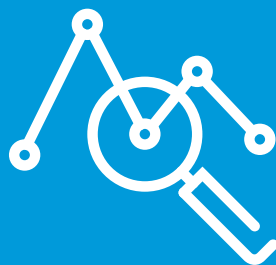
詹姆斯从英格兰银行的视角出发，成功描绘了20世纪末的英国经济政策。他也为从政治社会学角度对上述制度变革背后的深入故事开展亟需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关于标题。在英格兰银行获得独立地位后不久，满怀权力与荣耀的新工党经济团队曾访问该行并共进午餐。他们说，为了顺应“现代化”，你们应该抛弃18世纪的传统制服。我们回应说，英格兰银行不用抛弃所有传统，也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央行。总之，“现代化”一词并不十分贴切。重塑英格兰银行的两代人并不追求时髦，他们追求的是稳定。在这一点上，我们所有人都是一致的，而这至关重要。FD

保罗·塔克(Paul TUCKER)，《非民选权力》一书的作者，1980年至2013年间在英格兰银行工作。



全球经济



不平等与增长



亚洲



银行金融和税收



性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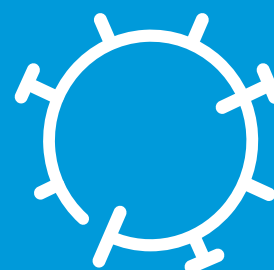
IMF漫画



债务



IMF 历史



新冠疫情



能源自然资源

最相关的精选清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主题的出版物。

[eLibrary.IMF.org/TopicGuide](https://elibrary.imf.org/TopicGuid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Finance & Development, December 2020



MFICA2020004